羣經概論目錄

羣經概論

導論

經的定義　中國經學，就時間方面說，僅從西漢初年起計算，已經有二千一百餘年的歷史；就分量方面說，僅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著錄，已經有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萬零四百二十七卷；然而，經的定義是什麼，到現在還是一個爭辯未決的問題。

我們要曉得經的定義，先要曉得經學上的學派，經學的學派，下文擬另節敍說，現在只要先知道大概可分爲四派：一、「西漢今文學派」；二、「東漢古文學派」；三、「宋學派」；四、「新史學派」。對於經的定義一問題，「宋學派」及「新史學派」不甚注意，但「西漢今文學派」（以下簡稱今文派）與「東漢古文學派」（以下簡稱古文派）卻是各有主張，而且爭辯非常激烈。

今文派以爲經是孔子著作的專名。孔子以前，不得有經；孔子以後的著作，也不得冒稱爲經。儒

們以爲經、傳、記、說四者的區別，由於著作者身分的不同；就是孔子所作的叫做經，弟子所述的叫做傳或叫做記，弟子後學展轉口傳的叫做說；一如佛教稱佛所說的爲經，禪師所說的爲律、爲論的不同。所以他們以爲只有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孔子手作，可以稱經。而樂在詩與禮中本沒有經文，所以實際上只有「五經」這個名辭可以成立。總之，依今文派說，所謂經，只有詩三百〇五篇，書今文二十八篇，儀禮十六篇（喪服傳爲子夏作不計）易的卦辭、爻辭、彖辭、象辭四種，以及「斷爛朝報」似的春秋經。對於這主張堅決地提出的，始於清龔自珍六經正名及六經正名答問諸文。其後如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廖平的知聖篇以及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諸書亦時有更明確更有系統的解說。

古文派與今文派相反，以爲經只是一切書籍的通稱，不是孔子的六經所能專有。在孔子以前，固然已有所謂經；在孔子以後的羣書也不妨稱爲經。他們以爲經、傳、論的不同，不是由於著作者的身分的區別，而只是由於書籍版本長短的差異。經的本義是線，就是訂書的線，也就是論語上所謂「韋編三絕」的「韋編」。古代經書竹簡，長短是有一定的，或二尺四寸，或一尺二寸（見鄭玄論語序。）傳是「專」的假借字，專在說文釋爲六寸簿，所以傳就是比經短點的書本。論，古僅作「侖」；

比次竹簡，使有次第，就稱爲論；論語之所以得名，就因爲牠是將孔子師弟問答編次成帙的緣故。所以他們以爲經是一切專書的通稱，如國語吳語「挾經秉枹」則兵書可以稱經；王充論衡謝短篇「至禮與律獨經也」則法律可以稱經；管子有經言、區言，則教令可以稱經；漢書律曆志援引世經，則歷史可以稱經；隋書經籍志著錄襍服經，則地志可以稱經；墨子有經上、經下篇，韓非子內外儲說篇另立綱要爲經，老子到漢代鄰氏次爲經傳，賈誼書有容經，則諸子也可以稱經。總之，依古文派說，經是一切書籍的通稱，不能佔爲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等經書的專名。對於這主張堅決地系統地提出的，始於近人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及原經諸文。

此外，還有立場於駢文學派的見地而提出經的定義的。他們以爲經是經緯組織的意思。六經中的文章，多是奇偶相生，聲韻相協，藻繪成章，好像治絲的經緯一樣，所以得稱爲經；換言之，六經的文章大抵是廣義的駢文體，也就是他們所謂「文言」。所以其他專書，只要是「文言」的，也可以稱爲經；如老子稱爲道德經，離騷稱爲離騷經等。這派是始於淸代反桐城派的駢文學家阮元；到近人劉師培著經學教科書，更提出比較有系統的主張。

對於經的定義，以上三派，新文學家借易經的文言以自重，近於附會，固不足取；但古文派過於空泛，今文派過於狹窄，也未見得使我們心服。總之，經是中國儒教書籍的尊稱，因歷代儒教徒意識形態的不同，所以經的定義逐漸演化，經的領域也逐漸擴張，由相傳爲孔子所刪訂的六經擴張到以孔子爲中心的其他書籍，如孟子、爾雅等。

經的領域　依上節所說，經的領域因歷代儒教徒意識形態的不同而逐漸擴張，所以在前代的記載上，每每有六經、五經、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及十四經二十一經等等的稱號。

六經　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者爲「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稱六經爲「六藝，」始見於史記滑稽列傳。其後班固漢書藝文志雖用劉歆七略，編次儒教經典的書籍稱爲「六藝略；」所謂六藝，亦就是六經。

五經　六經去樂，稱爲「五經。」宋徐堅等初學記說：「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爲五經。」按樂經的有無，今古文學的主張完全不同。依今文學說，樂本無經，樂即在詩與禮之中。依古文學說，樂本有經，因秦焚書而亡失。上舉的初學記，可視爲古文

學說之一例。今文家對於這主張最說得透澈的，首推清邵懿辰禮經通論。邵氏說：『樂本無經也。……夫聲之鏗鏘鼓舞，不可以言傳也；可以言傳，則如制氏等之琴調曲譜而已。……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之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欲知樂之大原，觀三百篇而可；欲知樂之大用，觀十七篇而可；而初非別有樂經也。……先儒惜樂經之亡，不知四術有樂，六經無樂，樂亡非經亡也。周、秦間六經、六藝之云，特自四術加以易、春秋耳。』據他的意見，五經而稱為六經，完全是習慣的關係；因為古代樂正崇四術（詩、書、禮、樂）以教士；後來加以易、春秋，遂稱六經；其實樂本來是沒有文字的。（或又主張六經去春秋而稱五經；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按這說不甚通行。）

七經　「七經」的名稱始見於後漢書趙典傳，繼見於三國志蜀書秦宓傳。清全祖望經史問答解釋說：『七經者，蓋六經之外，加論語；東漢則加孝經而去樂。』清杭紹炳考古類編解釋說：『有稱「七經」者，五經之外，兼周禮、儀禮也。』據這二說，則七經有三義：一以詩、書、禮、樂、易、春秋、論語為七經，二以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孝經為七經，三以詩、書、儀禮、周禮、禮記、易、春秋為七經。

九經　「九經」的名稱始見於唐書儒學傳谷那律傳。柴紹炳考古類編說：『有稱「九經」者，七經之外，兼論語、孝經也。』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說：『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爲九。』據這二說，則九經有二義：一以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爲九經，一以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爲九經。

十二經　「十二經」的名稱始見於莊子天道篇。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有三義：一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爲十二經。二以爲易上下經，幷孔子十翼，爲十二經。三以爲春秋十二公爲十二經。其後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說：『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這十二經是指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

十三經　「十三經」的名稱始於宋。皮錫瑞經學歷史說：『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爲九。宋又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爲十三經。』明顧炎武日知錄亦說：『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云九也。……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據這說，則以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爲十三經。

十四經　此外還有「十四經」的名稱，蓋附大戴禮記於十三經。宋史繩祖學齋佔畢說：「先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

二十一經　又清代段玉裁主張於十三經外，應增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說文解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八書爲二十一經，以爲這些都是保氏（周官掌敎國子的）書數之遺。見章炳麟檢論清儒篇。

總之，經的領域逐漸擴大，現在依普通的習慣，以十三經爲限，因爲十四經的名稱不甚普通，而二十一經不過是清代樸學家個人的主張。

經的次第　經的定義及經的領域兩問題以外，經的次第也是經學上一個素被忽略而其實非常重要的問題。對於經的次第，「宋學派」及「新史學派」無甚意見，但今古文學派卻仍是爭辯不決。

六經的次第，今文學派主張(1)詩，(2)書，(3)禮，(4)樂，(5)易，(6)春秋。而古文學派主張

(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他們兩派除在爲行文便利而偶爾顛倒外，決不隨便亂寫。現先將今古文學派的證據列下，然後加以說明。

一、今文學說：

(1)莊子天運篇「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2)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3)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

(4)司馬遷史記儒林傳序漢初傳經諸儒說：「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按依今文說樂本無經，故缺。）

(5)荀子儒效篇「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案缺易。）

(6)商君書農戰篇「詩、書、禮、樂、春秋。」（案亦缺易。）

(7)淮南子泰族訓『溫惠淳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辨義者，春秋之靡也。』（按易序倒亂。）

(8)禮記經解『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按易及樂序倒亂。）

(9)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10)莊子徐无鬼篇『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11)荀子儒效篇『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12)論語泰伯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13)論語述而篇『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二、古文學說：

(1)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序六經次第，首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樂，次春秋。

(2)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

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又下文序漢儒傳經的次第，亦是先易，次詩，次禮，次春秋，與史記儒林傳不同。（按古文說樂經亡佚，故缺。）

(3)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五經何謂也？易、尙書、詩、禮、樂也。』（按未及春秋。）

(4)許愼說文解字序『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按孟氏當作費氏，說見康有爲新學僞經考說文篇糾繆及章炳麟檢論淸儒篇。）

(5)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又下文序諸儒傳經次第，亦是先易，次書，次禮，次春秋，與漢書儒林傳合，與史記儒林傳不同。（按「毛」字衍文，說見顧炎武日知錄「史文衍字」條及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昌明時代」章。）

(6)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五經六籍，聖人設教，……今以著述早晚，經義總別，以成次第，出之如左。』按下文次第，一、周易；二、古文尙書；三、毛詩；四、三禮；五、春秋。又說：『周易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經之首。……古文尙書，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

……毛詩旣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宜次文王。……春秋旣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按六經次第，與漢書藝文志相同。

(7)唐長孫無忌隋書經籍志序諸儒傳經次第，亦先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春秋，與漢書藝文志相同。

今古文學對於六經次第的排列，是有意義的。所謂意義是什麼呢？就是古文學的排列次序是依六經產生時代的早晚，今文學卻是按六經內容程度的淺深。古文學家以易經的八卦是伏羲畫的，所以易列在第一。書經中最早的篇章是堯典，較伏羲爲晚，所以列在第二。詩經中最早的是商頌，較堯、舜又晚，所以列在第三。禮、樂，他們以爲是周公所作，在商之後，所以列在第四、第五。春秋是魯史，經過孔子的刪改，所以列在第六。這理由在上引的經典釋文序錄裏，已經說得很明白。至於今文學家對於六經次第的排列，頗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他們以詩、書、禮、樂是普通教育或初級教育的課程，所以列在先；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學、社會學及政治學的思想所在，可以說是孔子的專門教育或高級教育的課程，所以列在後。又詩、書是符號的（文字的）教育，禮、樂是實踐的（道德的）

陶冶，所以詩、書列在最先，禮、樂列在其次。這理由就上引的春秋繁露玉杯篇的文句，也可以窺見大概。

但是我們如果進一步的詢問，古文學家爲什麼以時代的早晚爲六經次第的標準，而今文學家爲什麼又依程度的淺深爲標準呢？這就不能不論及這兩派對於孔子觀念的不同。古文學家視孔子爲一史學家。他們以爲六經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謂「六經皆史」；孔子只是前代文化的保存者，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既是將前代的史料加以整理以傳授後人，則六經的次第應當按史料產生的早晚而排列。今文學家視孔子爲教育家、哲學家、政治家。他們以爲六經固有前代的史料，但這只是孔子「託古改制」的工具。孔子所着重的，不在於六經的文字事實，而在於六經的微言大義；這正如孟子讚美春秋所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既是一位改制的「素王」，則六經的次第當然要按程度的淺深而排列。至於這兩派的觀察究竟孰優，現因限於篇幅，暫略而不論。（可參考拙著經今古文學「經今古文異同示例」章。）

六經與孔子　儒教的經典，以孔子爲中心，這是很顯然的事實；但孔子與六經的關係究竟若

切到怎樣的程度，換言之，卽六經是否全部或一部分爲孔子所制作或刪述，則自來經學家的意見殊不一致。

對於孔子刪定六經的史迹記載得比較地有系統的，當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世家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

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依史記的話，則春秋是孔子因史記而作；易的一部分，如彖辭、象辭、繫辭、文言、說卦等，亦是孔子所作；詩是孔子所刪訂，書是孔子所編次，禮、樂亦是孔子所修正。然而，這些話仍未得自來經學家一致的承認。

關於孔子與六經的關係，就是六經的某一部分爲孔子所制作或爲孔子所刪述，自來經學家的意見，假使要詳密地羅列着比較着，可成爲數十萬言的專著，決不是這本小册子所能容納。現在只能舉出兩極端的主張，作爲代表，而畧去其他。所謂兩極端的主張，就是一種以爲五經（去樂不計）都是孔子所制作；一種以爲五經是五部各不相干的書，孔子沒有制作，也沒有刪述。前者可以清末皮錫瑞說爲代表，後者可以近人錢玄同先生說爲代表。

皮錫瑞在他所著的經學歷史及五經通論兩書裏，竭力主張五經爲孔子所作。他以爲五經的

原料固然有大部分是古代已有的篇籍，但將這些雜亂的篇籍，加以整理，給與以經學所特有的魂靈，即所謂「微言大義」，使成爲「經」，則實始於孔子。他說：「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删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爲法戒。……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删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删詩爲三百篇，删書爲百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辭、彖、象、文言，闡發義、文之旨，而後易不僅爲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筆削褒貶，爲後王立法，而後春秋不僅爲記事之書。此二經爲孔子所作，義尤顯著。」（見經學歷史「經學開闢時代」章）按皮氏爲清代今文學家，以五經爲孔子所制作，幾乎爲今文學者一致的主張，不過他們沒有主張易、禮爲孔子所作如皮氏這樣的澈底而已。

錢玄同先生在努力週刊讀書雜誌第十期上，根本的否認五經與孔子的關係。他以爲一、孔子沒有删述或制作六經的事。二、樂經本來無書；詩、書、禮、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書。三、將各不相干的五部書配成一部而名爲六經的緣故，是因爲附會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及孟子「孔

子作春秋」的話而成。四、六經的配成當在戰國之末。五、自六經名稱成立以後，於是荀子、商君書、禮記、春秋繁露、史記、漢書、白虎通等書一提及孔子，就併及六經，而且臆扯了什麼「五常」「五行」的鬼話來比附。六、因有所謂五經，於是將傳記羣書諸子亂加，而成爲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的名稱。他搜集了論語上談及詩、書、禮、樂、易、春秋的話而加以嚴密的考證，因而斷定一、詩是一部最古的總集；二、書是三代時候的「文件類編」或「檔案彙存」，應該認爲歷史；三、儀禮是戰國時代胡亂鈔成的僞書；四、易的原始的卦爻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符號，後來被孔子以後的儒者所假借，以發揮他們自己的哲理；五、春秋是五經中最不成東西的一部書，是所謂「斷爛朝報」或「流水賬簿」。（又見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册頁六七——八二）按錢先生可視爲近年來產生的「新古史學者」，新古史學者以懷疑精神重建中國古代史爲其特點，這種「六經孔子關係論」正可窺見近代經學研究之新的途徑。

總上所說，可知不僅經的定義、經的領域及經的次第仍在爭辯不決，就是這個經學上之最根本的問題，所謂六經與孔子的關係，也仍在激烈的論難中呢！

經學的派別　依上文所說，經學上問題的繁複正不下於其他學科；而其所以繁複的原因，就因為歷來經學家對於經典本身發生許多不同的見解。這許多見解不同的經學家說，如果詳盡的記述，也非專著不行；但如果應用史學家處置史料的手段，則這許多經學家說也不過可歸納為四大派。這四大派，就個人的意見可稱為一、西漢今文學派；二、東漢古文學派；三、宋學派；四、新史學派。

西漢今文學派產生於西漢初年，就是普通所謂「今文十四博士」之學。（十四博士，已見上。）當西漢時候，因為帝王之利用的提倡，在學術界幾有獨尊之勢。後來因為古文學派的暴興，及鄭玄、王肅等的混淆家法，遂漸漸的衰落。延到曹魏、西晉，因為政亂及胡禍的過烈，連僅存的章句傳說也多隨兵燹而亡佚。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末葉，因為社會、政治、學術各方面趨勢的匯合，於是這骸骨似的今文學忽然復活，居然在學術界有當者披靡之象。當時所稱以莊存與為開山大師的「常州學派」、「公羊學派」，就是這西漢博士的裔孫。現在今文學大師雖多已殂落，但今文學派的影響仍然在學術界存在着；而且最近新史學派的產生，也大部分以今文學為基點。

東漢古文學派，如果稍為慎密點說，可以說是產生於西漢末年。到了東漢，因為今文學派自身

的腐化，及古文學大師的努力，大有取今文學派而代之的趨勢。鄭玄、王肅雖說混淆家法，但究竟偏袒古文學；所以魏、晉時代，今文學亡滅，而古文學反日趨於發揚開展。後來六朝的南北學，隋、唐的義疏派，雖虛實繁簡，不必盡同，但其立場於古文學，則初無二致。一直到了北宋慶曆以後，懷疑學派——宋學派——崛興，於是這正統派的古文學纔暫時衰歇。但元、明末葉，因為姚江學派（即王陽明學派）之流於虛妄，及滿清思想壓迫政策的實現，於是顧炎武扛了「舍經學無理學」的大旗來復興古文學。清代三百年學術界的權威，遂為這一派所獨佔；所謂以惠棟為領袖的「吳派」及以戴震為領袖的「皖派」，都和東漢古文學派有血統的關係。現在古文學大師，碩果僅存的，也只有章炳麟。至於古文學的影響，在學術界仍有相當的勢力；近年來中國文字學、聲音學以及考證學的發展，雖大部分可認為受外來學術思想的影響，但亦不能不說是在接受古文學派的遺產。

宋學派產生於北宋慶曆以後。但宋學之懷疑的精神，唐時經師如趙匡、啖助、陸淳等已開其端。到了南宋，因研究方法的不同，可分為以朱熹為領袖的「歸納派」，以陸九淵為領袖的「演繹派」及以陳亮、葉適為領袖的「批評派」三派。朱、陸兩派的哲學見解雖大相違背，但其以理欲心性等

問題爲論究的對象而借助於經學的解釋，則大致相同。陳、葉一派，即普通所稱爲「浙東學派」，雖朱、陸並譏，但因爲自身對經學沒有建設，其末流遂折入史學與文學。所以，依正統派的見解，宋代只可說有哲學、史學與文學，而沒有經學。元、明以來，歸納派的朱學因朝廷之利用的提倡，僥倖地獲得獨佔的地位；而演繹派因王守仁生力軍似的加入，也頗能得具有天才的學者的信仰。但這兩派都是假借經學以冒「理學」，結果所謂「尊德性」者固然是流於禪釋，即所謂「道問學」者亦空疏無物。於是元、明兩代成爲經學史上的衰落時期，而東漢古文學遂得乘之而復興。現在學術界的現象，比較地可說近於宋學派的，大概只在懷疑經典精神之復興一點；至於那些欲以唯心的見地踩道統的繼承，則只見其非愚即誣而已。

新史學派可以說是產生於「五四運動」前後，（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到現在還不過十餘年。這是超漢、宋學，超今古文學，而以歷史的方法去研究經學的新學派。因爲時間的短促，現在還不能說有怎樣的成績；但是因爲牠一方接受歷來經學學派的遺產，一方接受外來學術思想的影響，終於成爲經學上的最後而且最新的一派；其具有發展的可能性，是毋庸懷疑的。這派就現

在說，可再細分爲三派：一派，是以今文學爲基點，攝取宋學之懷疑的精神，而輔以古文學之考證的方法；上舉的錢玄同先生，即可視爲這派的著名者。一派，是以古文學爲基點，接受外來考古學的方法，尋求地下的實物以校正記載；新近逝世的王國維，即可視爲這派的領袖。一派，以外來的唯物史觀爲中心思想，以經學爲史料，考證中國古代社會的眞相，以爲解決中國目前社會問題方案的初步；著孔子學說之發展（見新生命雜誌第二卷第九號）的陶希聖先生及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郭沫若先生，都可歸隸於這一派。

上舉經學的四派，自然是極其粗枝大葉的敍述。除新史學派外，其餘三派的不同，可以簡勁的說：今文學派以孔子爲政治家，以六經爲孔子政治之說，所以偏重於微言大義，其特色爲功利的，而其流弊爲狂妄；古文學派以孔子爲史學家，以六經爲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其特色爲考證的，而其流弊爲煩瑣；宋學派以孔子爲哲學家，以六經爲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於心性理氣，其特色爲玄想的，而其流弊爲空疎。至於新史學派，其目的在求孔子與六經的眞相，老實地說，已超出含有宗教性的經學的範圍而入於史學的領域了。

本論

一　易經

八卦與重卦　易經可分爲符號與文字兩部分。符號部分又可分爲二：一爲「八卦」，二爲「六十四卦」。「八卦」爲☰（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種，相傳始於伏犧，合⚊（陽）⚋（陰）兩種符號而成。六十四卦由八卦相重而成，如乾坤兩卦相重而成䷋（否卦），坤乾兩卦相重而成䷊（泰卦），坎離兩卦相重而成䷾（既濟卦），離坎兩卦相重而成䷿（未濟卦）等。重卦是誰，據孔穎達周易正義，凡有四說：一、以爲伏犧，王弼等主之；二、以爲神農，漢鄭玄等主之；三、以爲夏禹，晉孫盛主之；四、以爲周文王，漢司馬遷等主之。按淮南子要略篇有「伏犧爲之六十四變」的話，則伏犧重卦說已始於西漢，不始於晉王弼。這四說究竟孰是孰非，現在無法考證。普通的說法，或主第一說，以爲伏犧；或主第四說，以爲文王。

易經的內容與作者　易經的文字部分又可分經與傳。經的部分又再分爲二：一爲卦辭，二爲爻辭。以易經的首卦「乾卦」（䷀）爲例，『乾：元、亨、利、貞』爲卦辭。『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等爲爻辭。——所謂爻，指每卦的六畫。⚊爲陽爻，⚋爲陰爻。陽爻稱爲「九」，陰爻稱爲「六」。牠的次第，由下而上，所以乾卦的初爻稱「初九」，二爻稱「九二」，三爻稱「九三」，四爻稱「九四」，五爻稱「九五」，六爻稱「上九」。——凡以文句定全卦的意義的曰卦辭，以文句解釋每一爻的意義的曰爻辭。卦辭及爻辭的作者是誰，歷來經學家的意見也不一致。據周易正義，以爲有兩說：一以爲卦辭、爻辭都是文王所作，鄭玄等主之；二以爲爻辭每記述文王以後的事情，因主張卦辭爲文王所作，爻辭爲周公所作，漢馬融、吳陸績等主之。但這兩說以外，清末皮錫瑞撰五經通論及經學歷史，又以爲卦辭及爻辭都爲孔子所作；他以爲伏犧畫卦，文王重卦，只有符號而無文字，到孔子纔加以卦辭、爻辭而後成爲易經。這可視爲今文學的極端派的說法，當代古文學者如章炳麟等，都反對他。

易傳的內容與作者　易傳的部分又再分爲七種，計十篇：一、彖辭上；二、彖辭下；三、象辭上；四、象辭下；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文言；八、說卦；九、序卦；十、雜卦。彖辭所以解釋卦辭，以乾卦爲例，（下同）如『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一段就是彖辭。象辭又分爲「大象」、「小象」。「大象」所以解釋全卦所從的象，如『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小象」所以解釋每爻所從的象，亦即解釋爻辭，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一段。易經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篇，所以彖辭及象辭也分上下。繫辭偏於說理，大致追述易義的起源，推論易學的作用，或解釋卦義以補充彖辭、象辭。因爲簡編繁重，分爲上下；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爲上繫，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爲下繫。文言所謂『文飾之言』，專解乾坤兩卦，因爲乾坤爲易的門戶，其牠卦爻都由乾坤而出，所以特作文言；今本易經附於乾坤二卦之後。說卦偏於說象，大致陳說八卦的德業、變化與法象。序卦說明六十四卦相承相生的次序。雜卦雜舉六十四卦的卦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說卦、序卦、雜卦，今本易經都另立卷帙，很易明瞭。

還彖辭、象辭、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十篇，相傳稱爲「十翼」，亦稱易傳，爲孔子所作。這問題在經學上爭論頗烈，到現在還沒有正當的解決。大概地說：古文學派相信十翼說；今文學派反對十翼說；宋學派以爲繫辭、文言以下都非孔子所作；新史學派以爲易是一部雜湊的書，根本與孔子無關。——古文學說可參考周易正義；今文學說可參考皮錫瑞易經通論「論卦辭爻辭卽是繫辭，十翼之說於古無徵」一節；宋學派可參考歐陽修歐陽文忠公全集易童子問；新史學派可參考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頁七七錢玄同先生論易一段。

易學的派別　易學大別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及古文兩派，宋學又可分爲義理及圖書兩派。

易今文學分爲四家：曰施氏，曰孟氏，曰梁丘氏，曰京氏，西漢時，都立於學官。秦始皇焚書，易用於卜筮，相傳不絕。漢興，田何傳易，以授王同、周王孫、服生、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田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於是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之學。孟氏之學傳於焦延壽，焦延壽以授京房，於是易又有京氏之學。（孟氏弟子白光、翟牧不承認焦易出於孟喜。）東漢時，虞光世傳孟氏易，五傳至三國吳虞翻，作周

易注、易律曆、周易集林、周易日月變例等書，爲今文易學的支流。西晉永嘉之亂，施氏、梁丘氏亡佚，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易今文學忽然中衰。歷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到清代漢學重興，易今文學纔大略可見。當時由惠棟開其端，張惠言繼其後，而焦循更異軍突起，自成一家學說，已超出今文學的個域。惠棟作周易述、易漢學，棟弟子江藩作周易述補，張惠言作周易虞氏義、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禮、虞氏易事、虞氏易言、虞氏易候，劉逢祿作易虞氏五述，曾釗作周易虞氏義箋等書，孟、京易學，於是重興。但惠、張諸人，以漢學爲歸，不專主今文，所以虞氏以外，亦兼及鄭玄、荀爽等之易古文學的支流，還不能視爲易今文學的專家。

易古文學有費氏一家。費氏易出於費直，西漢時，未立於學官，其來源不可考。據漢書儒林傳，說他長於卦筮，無章句，僅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但據隋書經籍志，說他有周易注四卷，新舊唐書藝文志及經典釋文序錄亦說他有周易章句四卷，與漢書無章句的話不合。其所以稱爲古文，因爲據漢書藝文志說，劉向以中祕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有脫落，唯費氏經與古文相同；但今文學者對於劉向的中古文根本否認，而以爲劉歆誣父的話。東漢時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等，都習

費氏易，爲作傳注，費氏大盛。魏王弼以老、莊解易，雖仍依費氏舊本，然盡掃漢儒象數之論，已超出漢學的範圍，而表現魏、晉清談家的風度。南北朝時，北朝雖仍用鄭注，而南朝則梁、陳學官兼列鄭、王。隋唐以後，王注盛行；孔穎達作周易正義，亦以王注爲宗。當時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史徵作周易口義訣，雖力崇漢學，排斥王注，然終無救於鄭學的衰歇。到了清代，惠棟、張惠言等輩出，於是鄭玄、荀爽的易學又大略可考。張氏更作有周易鄭氏義、荀氏九家義等書，專究鄭、荀易學。

與費氏同爲西漢民間的易學，而未有確證指爲今文或古文的，另有高氏一家。高氏易出於高相，自說出於丁寬。據漢書儒林傳，高氏與費氏同時，也沒有章句，專說陰陽災異；據隋書經籍志，高氏易爲費氏弟子王璜所授，與漢書不同。如果高氏出於丁寬，則當隸今文易，但當西漢今文學盛行時候，又何以不被列於學官？如果高氏出於費氏，則當隸於古文易，但漢書何以不明說，而必有待於後來的隋書？據隋書說，高氏亡於西晉，其學已完全無可考。所以在極端派的今文學家，或斥高氏易的名稱爲古文學家所僞造，不過爲費氏易張目之用。

易學到宋而大變。易宋學既不是兩漢象數的面目，又不是魏、晉玄理的立場，而自具宋學之特

有的見地。易宋學的派別，如果詳盡的說，也很繁雜；但僅舉在經學史上有權威的學派而說，則只有兩派：一爲圖書派，一爲義理派。

圖書派起源於宋初道士陳摶。摶本方士鍊丹術的理論，造作先天後天圖，撰易龍圖一書。摶學又分爲二支：一支由陳摶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李之才傳邵雍，邵雍傳子伯溫，撰易學辨惑。一支由陳摶傳种放，种放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范諤昌傳劉牧，撰易數鉤隱圖。這兩支派都附會古代所謂「河圖」「洛書」以黑白點子談易。後來邵易盛行，劉易漸衰。南宋時，朱熹作周易本義、易學啟蒙，意欲合義理與圖書兩派，集易宋學的大成，遂雜用邵說；但結果這道士式的易學在宋、元、明三代竟成爲易學正統。到了清初，懷疑「圖書」的學者發出。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羲弟宗炎作圖書辨惑，毛奇齡作圖書原舛編，胡渭作易圖明辨，於是宋易圖書派在經學史上成爲毫無價值的一派。

義理派起源於胡瑗。瑗作易傳；瑗弟子倪天隱作周易口義，更暢師說。其學掃除西漢災異之說、東漢緯讖之說、魏晉老莊之說，而一歸於性命道德之理的討究。繼胡而起的爲程頤。頤爲周敦頤的弟子，與邵雍爲姻婭，然其所作易傳，不取周氏「太極圖」說及邵氏圖書說，而一衷於義理。頤答張

閎中書說：『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見程氏遺書）很可考見程氏義理派的立場。其後宗程氏的，有程弟子郭忠孝兼山易解，忠孝子雍郭氏傳家易說，項安世周易玩辭，楊萬里誠齋易傳，方聞一大易粹言，鄭汝諧易翼傳，許衡讀易私言，趙汸周易文詮等，然皆未能超越程傳。到了清代，研究漢易成爲風氣，於是義理派也逐漸衰落。

易宋學除上述兩派外，或以事說易，以司馬光、張載爲代表；或以心說易，以楊簡爲代表；或仍言象數，以朱震爲代表；或專輯古注，以房審權爲代表；或考正古本，以呂祖謙爲代表；但都未形成學派，故略而不談。至於折衷程朱、調和義理圖書的，因爲他自身沒有明確的立場與特到的見地，現亦從略。

二　尚書

尚書的種類　尚書在諸經中是糾紛最多的一經；因爲其他各經，只有字體的異同，只有經說

的爭辯，而尙書則經典本身就有或眞或僞之別。如果我們不加思索，以十三經注疏中的尙書正義爲標準經典，則我們將要被僞作所欺騙。

尙書可分爲三種：一、西漢時候立於學官的今文尙書；二、相傳爲西漢時候在孔子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尙書；三、東晉時候由梅賾所獻的僞古文尙書。而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中尙書就是今文尙書與僞古文尙書的混合品。（此外尙另有西漢時張霸所僞造的百二篇尙書及後漢時杜林在西州所得的漆書古文尙書兩種，以無甚關係，從略。）

今文尙書的篇目與來源　今文尙書凡二十九篇，爲：堯典一（合今舜典篇而沒有舜典篇首二十八字）皐陶謨二（合今本益稷篇）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泰誓十（非今本僞泰誓）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合今本康王之誥，）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其中盤庚分爲上中下三篇，泰誓亦分爲上中下三篇，顧命另分出康王之誥一篇，所以今文尙書二十九篇亦可稱爲三

十四篇。依普通的經說，這二十九篇爲漢初伏生相傳，以漢時當代的文字隸書抄寫，所以稱爲今文尚書。（其中泰誓一篇各家意見不一致，暫從略。）

古文尚書的篇目與來源　古文尚書亦稱逸書，相傳凡十六篇：爲舜典一（別有舜典而非今本由堯典分出的舜典）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別有棄稷而非今本由皐陶謨分出的益稷，）五子之歌六，胤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畢命十六。其中九共分爲九篇，所以古文尚書十六篇亦可稱爲二十四篇。這十六篇據古文學家說，是漢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壁而得，因爲是以古文書寫，所以稱爲古文尚書。據說當時孔子後裔孔安國擬獻書朝廷，因巫蠱事發，遂罷。後來這古文尚書並沒有留傳下來，後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也只存各篇題目而沒有師說，所以清代的今文學家頗懷疑這古文尚書的獲得是漢代古文學家的僞說。

僞古文尚書的篇目與來源　僞古文尚書凡二十五篇：爲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上七，太甲中八，太甲下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上十一，說命中十二，說命下

十三，泰誓上十四，泰誓中十五，泰誓下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與這二十五篇總稱僞古文尚書同時出現的爲僞孔安國尚書傳。今本尚書注疏就是以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加其今文尚書三十三篇共五十八篇及僞孔安國尚書傳爲底本。（今文尚書本三十四篇，去泰誓三篇，分堯典下半爲舜典而另加篇首二十八字，分皋陶謨下半爲益稷，故爲三十三篇。）這僞古文尚書及僞孔傳，爲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或作梅頤）所獻，曾立於學官。唐代頒布五經正義爲取士標準，書取僞孔，於是該書愈益盛行。到了宋吳棫作書稗傳，始疑這二十五篇及孔傳爲僞。朱熹語類中也頗有疑辭。明梅鷟作尚書考異，始明斥爲僞作，但論證還不確切。清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惠棟作古文尚書考，始用樸學家考證的方法，一一發現牠的來源。丁晏作尚書餘論，更證明這是晉王肅所僞作。到了現在，這僞古文尚書及僞孔安國尚書傳的公案，總算是經學史上已經解決的問題。——雖然清毛奇齡曾作了古文尚書寃詞，爲僞古文尚書辯護。

此外，尚書如詩經的詩序一樣，而有所謂書序。書序的眞僞，經學家的意見也不一致，因爲對於

尚書研究沒有十分重要關係，故從略。

尚書學的派別　尚書學大別為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為今文及古文兩派。

尚書今文學分為三家：曰歐陽氏，曰大夏侯氏，曰小夏侯氏，西漢時，都立於學官。漢初，濟南伏生傳今文尚書，以授鼂錯及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兒寬授歐陽生的兒子，世傳書學，一直到曾孫歐陽高。這是尚書歐陽氏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這是尚書大夏侯之學。勝授從子建，又別為尚書小夏侯之學。西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都亡佚。一直到清代輯佚學興，陳喬樅撰今文尚書經說考及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西漢今文學說始大略可考。同時今文學派崛起，魏源撰書古微，排黜古文學派，而上溯西漢今文學說。近人崔適撰史記探源，更由史籍以求今文書學的異相。

尚書古文學僅有孔氏一家。相傳孔安國得孔壁古文尚書，以授膠東庸生，五傳而至桑欽。西漢末，劉歆崇奉古文，與今文博士爭立學官。東漢時，書古文學家著名的有賈逵、孔僖、尹咸、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等。馬融、鄭玄雖間或雜糅今古，但仍偏袒古學。自東漢末年一直到南北朝的北朝，書學都

以鄭玄注爲宗；雖魏王肅作尙書解，蜀李譔作尙書傳，以及吳虞翻等力攻鄭注，但仍未出古文學的範圍。到唐孔穎達作尙書正義，以僞孔安國尙書傳爲宗，於是由賈古文學派生的鄭學亦亡。到了淸代，漢學重興，惠棟弟子江聲作尙書集注音疏，王鳴盛作尙書後案，孫星衍作尙書古今文注疏，戴震弟子段玉裁作古文尙書撰異，都以馬融、鄭玄傳注爲依歸，於是古文學又大略可見。

與漢古文學有關而實非眞古文學的，還有從魏晉到隋唐間盛行的僞古文尙書及僞孔安國傳一派。這僞書與僞傳，究竟是誰造作，學者間還沒有一致的意見，或以爲王肅，或以爲皇甫謐，或以爲梅賾。總之，於東晉元帝時，始由梅賾獻奏。據梅賾說，由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始授賾。當時晉代君臣，信僞爲眞，於是遂立於學官。南北朝時，南朝梁費甝爲僞古文尙書作義疏；齊姚方興並僞造舜典孔傳一篇，自稱得於大桁頭，對經文妄加增益。但當時北朝仍崇奉鄭玄尙書注，南朝梁陳二代也是鄭、孔並立，僞書僞傳還沒有獨佔的勢力。到了隋代劉炫，得南朝費甝義疏，兼崇姚方興僞書，又增益舜典十六字，於是北方人士也黜鄭崇孔。唐孔穎達作尙書正義，以僞孔爲宗，由是這僞書僞傳遂成爲標準經典。到了後來，宋吳棫、朱熹，明梅鷟，淸閻若璩、惠棟、丁晏等，相繼攻擊僞書僞傳，

於是這經學上一大公案始得解決。（關於諸人攻僞諸書，已詳前節，現從略。）

書宋學派非如書漢學派之有家數可舉；其特點在善於懷疑，開清代攻擊僞孔的端緒；其流弊在全憑臆說好以主觀妄論古代的史實。宋儒治尙書的，始於蘇軾書傳。蘇書廢棄古注，以議論見長，一變從前治經的方法。其後林之奇作尙書全解，鄭伯熊作書說，之奇弟子呂祖謙作書說，又以史學說書。其他如夏僎尙書解，黃倫尙書精義，魏了翁尙書要義，胡士行尙書詳說等書，雖略存古訓，但雜糅漢、宋，全依主見爲取舍。朱、陸兩派門人亦治尙書；楊簡作五誥解，承沿陸說，闡以心學釋書；蔡沈作書經集傳，祖述朱義，在元、明兩代居然成爲標準經典。元儒如金履祥、陳櫟、董鼎、陳師凱、朱祖義等都宗蔡傳；明代輯書傳大全，亦以蔡傳爲主，且頒爲功令。當時敢於糾正蔡傳的，僅有馬明衡尙書疑義，王樵尙書日記，袁仁尙書砭蔡編，王夫之書經稗疏等而已。總之，以主觀妄測古史，幾爲宋代書學的通病。如西伯戡黎，舊說以西伯指文王，但蔡傳依薛季宣書古文訓說，以爲武王。如康誥，舊說以爲周公踐位稱王，封康叔於衞，故有「朕其弟」的話，但蔡傳堅持周公未代王，又無法解說「朕其弟，」於是亦移爲武王。最甚的，如元儒王柏作書疑，移易經文，以大誥、洛誥等篇爲不足信，其懷疑精神雖

不無可佩，但究竟方法與觀點都不免錯誤，而使經學有治絲益棼的弊病。

三　詩經

詩經的內容與篇數　詩經現存三百零五篇，分爲風、雅、頌三大類。風分爲十五國風，計共一百六十篇；雅分爲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頌分爲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詩古文學派毛氏主張詩經應有三百十一篇，卽三百零五篇外加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但這六篇僅有篇名而沒有文辭，實不應計算在內。）

風雅頌的區分　風、雅、頌的區別，歷來經學家的意見非常紛歧；比較重要的，約有三說：一，以爲由於詩篇內容的不同，詩大序說可爲代表。詩大序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按原文不甚明切，勉強的加以疏釋，大概以爲：風是關於個人的，雅是關於王政的，

頌是關於神明的。二以爲由於詩篇作者的不同，宋鄭樵詩辨妄說可爲代表。鄭說：「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而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所能言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言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他以爲風出於普通平民，雅出於朝廷士大夫。三，以爲由於詩篇音調的不同，淸惠周惕詩說可爲代表。惠說：「風、雅、頌以音別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按這三說，如果以現存的風、雅、頌一篇一篇的去考校，都有難通之點，所以這問題仍是經學史上沒有解決的問題。

國風的次第　國風的次第，據現存的毛詩（詩古文學派，詳下）爲：一、周南，十一篇；二、召南，十四篇；三、邶風，十九篇；四、鄘風，十篇；五、衛風，十篇；六、王風，十篇；七、鄭風，二十一篇；八、齊風，十一篇；九、魏風，七篇；十、唐風，十二篇；十一、秦風，十篇；十二、陳風，十篇；十三、檜風，四篇；十四、曹風，四篇；十五、豳風，七篇。

但除了這次第以外，還有兩種：一爲一、周南，二、召南，三、邶，四、鄘，五、衛，六、王，七、鄭，八、齊，九、豳，十、秦，十一、魏，十二、唐，十三、陳，十四、檜，十五、曹，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傳；一爲一、周南，二、召南，三、邶，四、鄘，五、衛，六、檜，七、鄭，八、齊，九、魏，十、唐，十一、秦，十二、陳，十三、曹，十四、豳，十五、王，見鄭玄詩譜。宋歐陽修曾爲毛詩次第疏釋，作十五國風次解，以爲：「國風之次，以兩而會之，分其次以爲比。……周、召以深淺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但清魏源詩古微又以爲：左傳所載是孔子沒有刪訂以前的周太師樂歌的次第，因爲豈合民風相近的爲一類，所以邶、鄘、衛、王東都之地爲一類，豳、秦西都之地爲一類，鄭、齊爲一類，唐、魏爲一類，陳、檜、曹小國爲一類；詩譜所說是孔子已經刪訂以後魯、韓詩（今文學派詳下）傳授的次第，牠所以挈豳於後，先唐於秦，王在豳後，檜在鄭先，都有大義存於其間；至於毛詩次第，進王退檜，既非太師原第，又乖孔子古義，不足爲法。按魏氏爲清今文學家，所以不以古文學派毛詩爲然。

大小雅的篇第　小雅共七十四篇，計一、鹿鳴之什十篇，二、南有嘉魚之什十篇，三、鴻雁之什十篇，四、節南山之什十篇，五、谷風之什十篇，六、甫田之什十篇，七、魚藻之什十四篇。大雅共三十一篇，計

一、文王之什十篇，二、生民之什十篇，三、蕩之什十一篇。小雅、大雅依政治的汙隆，都有所謂「正」「變」；小雅從鹿鳴到菁菁者莪為正，六月以下為變；大雅從文王到卷阿為正，民勞以下為變。但這些話，就現在看，都有可研究或商榷的餘地。

三頌的篇第與作者　頌，周頌共三十一篇；計一、清廟之什十篇，二、臣工之什十篇，三、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魯頌計駉之什四篇。商頌五篇。魯頌、商頌的作者及其命意，古文學毛詩與今文學齊、魯、韓三家詩完全不同。魯頌，古文學派以為季孫行父作，今文學派以為奚斯作。商頌，古文學派以為戴公時正考父得於周太師，今文學派即以為正考父作。魯頌、商頌所以與周頌並列，古文家派以為商、魯得用天子的禮樂，故同於周室；今文學派則以為周、魯、商三頌與春秋公羊傳所說「王魯、新周、故宋」的「三統說」相通。

詩序的作者及其爭辯　詩經還有一問題為經學家所爭辯未決的，就是現存毛詩的詩序。現存詩序有大小序的分別；列在各詩之前，說明詩中大意的，是小序；連在首篇關雎的小序之後，概論全經的，是大序。（據孔穎達毛詩正義，是從「風，風也」句以下。）詩序的作者，到現在還沒有定論。

一、漢鄭玄詩譜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二、魏王肅家語註以爲詩序全爲子夏所作。三、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衞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四、隋書經籍志以爲詩序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衞宏加以潤益。五、唐韓愈以爲子夏不序詩，學者欲顯其傳，故借子夏之名。六、唐成伯璵以爲子夏惟作詩序首句，以下出於毛公。七、宋王安石以爲詩序爲詩人所自製。八、宋程頤以爲小序是國史舊文，大序是孔子作。九、宋蘇轍以爲衞宏所作詩序已非孔子舊文，只存其首句。十、宋王得臣以爲詩序首句是孔子所題。十一、宋曹粹中以爲毛傳初行，未有詩序，後來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師說而成。十二、宋鄭樵詩辨妄以爲詩序是村野妄人所作。其後王質、朱熹、呂祖謙、陳傅良、葉適及清代顧炎武、崔述也都對於這問題參加辯難。（詳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九十九。）其實這問題在目前無法解決；而且詩序對於詩經，只是障礙，而不是一種工具，大可置之不論。

詩經學的派別　詩經學可分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及古文兩派。

詩今文學分爲魯、齊、韓三家，西漢時，都立於學官。一、魯詩溯源於荀卿，創始於魯人申培。（亦稱申公。）據漢書楚元王傳，荀卿授詩浮丘伯，伯授申培、楚元王、穆生及白生，申培於文帝時以治詩爲

博士。據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二、齊詩創始於齊人轅固生；景帝時，以治詩爲博士。三、韓詩創始於燕人韓嬰；文帝時，爲博士。據儒林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與齊、魯閒殊。」三家詩，齊詩亡於魏代，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者。南宋以後，韓詩亦亡，僅存外傳。到了清代，輯佚學及今文學興起，於是久已衰亡的今文詩學又成爲學者討究的對象。關於這類的著作，有一、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二、齊詩翼氏學疏證，三、詩四家異文考（三家加古文學毛氏，故爲四家。）四、迮鶴壽齊詩翼氏學，五、魏源詩古微（以上都見續清經解，）六、丁晏三家詩補注，七、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以上都見清經解，）八、范家相、葉鈞重訂三家詩拾遺（見嶺南遺書，）九、阮元三家詩補遺（見觀古堂彙刻書，）十、江翰詩四家異文考補（見晨風閣叢書，）十一、王先謙三家詩義疏（原刻本。）其中以陳、魏、王三家書爲較重要。

詩古文學僅有毛氏一家。毛詩相傳創始於毛公。據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以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據漢書藝文志，毛公詩學自謂傳自子夏，其著作有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毛詩的傳授，毛公的名字，毛詩故訓傳的作者，諸說多不一致，所以今文學家時藉此加以攻擊。據漢末鄭玄詩譜說：魯人大

毛公爲訓故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但據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說：

「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又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引吳徐整說：「子夏（卽卜商）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名萇）。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立於學。」按漢書但言毛公，不載毛公的名字，也未有大小毛公的分別；到了鄭玄，有大小毛公的分別，且以詩故訓傳爲大毛公作；到了陸璣，又說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而徐整所說的傳授世數與人名又與陸璣不同。後說加詳，而且互有矛盾，實與人以可疑。毛詩，西漢時未立於學官，但盛行於東漢。當時著名學者，如鄭衆、賈逵、馬融、鄭玄，都治毛詩。鄭玄復爲毛公詩傳作箋，雖采今文三家詩說，自成其混淆家法的「通學派，」盛行一時。三國時，魏王肅作詩解，蜀李譔作毛詩傳，雖與鄭箋立異，但仍未脫毛氏的範圍。南北朝時，北朝兼崇毛、鄭；南朝雖崇毛傳，但對於鄭、王異同，互相申駁。唐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守疏不破注的原則，引申毛、鄭兩家的經說，成爲當時標

羣經典。及宋學崛興，毛、鄭之學漸衰，到了清代，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戴震作毛鄭詩考正，馬瑞辰作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作毛詩後箋，都以疏通毛、鄭爲標的。戴氏再傳弟子陳奐作毛詩義疏，始去鄭用毛，恢復詩古文學的本來面目；又作鄭氏箋考徵，考證鄭箋的來原；於是毛詩古文學又遂大行於清代中葉。

詩宋學派非如詩漢學派之有家數可舉；其特點在能就經典本身加以討究，其流弊在好以主觀臆見淆亂古義。宋儒治詩經的，始於歐陽修毛詩本義。本義辨詰毛、鄭，斷以己意，力反東漢以來治詩的舊習。蘇轍繼起，作詩集傳，始攻擊毛序，僅存錄首句。南宋時，鄭樵作詩傳辨妄，直斥詩序爲村野妄人所作。朱熹受鄭樵的影響，作詩集傳及詩序辨說。詩集傳不僅棄序不用，而且雜採毛、鄭，間錄三家，以己意爲取舍。又以爲詩三百五篇中男女淫佚之詩凡二十四，一反從來「思無邪」之傳統的經說。朱子既歿，輔廣作詩童子問，朱鑑作詩傳遺說，都對於詩集傳加以補充。元儒如許謙、劉瑾、梁益、朱公遷、梁寅等也都以集傳爲依歸。王柏且依朱說作詩疑，居然改竄經文，刪削淫詩三十二篇。明代胡廣等輯詩經大全，依據劉瑾詩傳通釋一書，頗爲功令；蓋朱熹詩集傳已取代毛鄭詩學之正統的

地位了。當時反對朱說的雖也頗不乏人，如陳傳良說：『以城闕爲儇期之所，彤管爲淫奔之具，竊所未安。』（見葉紹翁四朝見聞錄）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亦力辨淫詩之說。（見卷百七十八經籍考）然都無法阻止朱傳的流行。直到清代漢學復盛，於是詩宋學始漸不爲世所重。當時宋學力以懷疑精神表現的時候，也頗有一二學者以徵實著名；如蔡卞作毛詩名物解，王應麟作詩地理考。應麟更作詩考，採掇今文三家詩的遺說，開清代輯佚學的先河。

四　三禮——周禮儀禮與禮記

周禮的命名與篇第　周禮本名周官（始見史記封禪書），亦稱周官經（見漢書藝文志）後稱周官禮（見漢書藝文志顏師古註）又尊稱爲禮經（見荀悅漢紀卷二十五今文學家都反對這說。）賈公彥周禮義疏加以解釋，以爲『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說亦未可盡信。周禮凡六篇：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但冬官一篇早已亡佚，當時補以考工記，稱爲冬官考工記。

周禮的來源　周禮爲古文學最重要的書籍，亦爲歷來經學家爭辯最激烈的書籍。關於周禮的出現，諸說紛紜：(一)以爲漢武帝時發現。唐賈公彥周禮義疏序周禮興廢引馬融傳說：「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他以爲周禮因秦始皇焚書而隱藏，因漢武帝提倡儒學而出現，復因藏於宮庭圖書館而不行於當時。(二)以爲漢河間獻王所得。漢書河間獻王傳說：「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三)以爲河間獻王時李氏所得。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引或說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隋書經籍志則以爲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獻王補以考工記上奏。唐杜佑通典禮篇說亦同。(四)以爲與古文尙書等同時發現於孔壁。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書題引漢鄭玄六藝論說：「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太平御覽學部引揚泉物理論說：「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官，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五)以爲與逸禮同爲孔安國所獻。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說：「孔安國獻禮

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按以上五說，孫詒讓周禮正義以爲（四）（五）兩說虛妄不足信，然（一）（二）（三）三說亦參差不同，所以周禮一書，頗引起宋學派及今文學派學者的懷疑。

周禮的作者及其爭辯　關於周禮的作者，學者間亦爭辯頗烈；大抵古文學家以爲周公所作，今文學家以爲非周公所作，甚至斥爲劉歆所僞造。古文學家中，最初主張周禮爲周公所作的，是西漢末年的劉歆。據唐賈公彥周禮義疏序周禮興廢引馬融傳，以爲劉歆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道。據漢書藝文志及荀悅漢紀，亦以爲王莽時，劉歆爲周禮置博士。後來繼承劉歆的主張的，是東漢末年的鄭玄。鄭註周禮，於首句「惟王建國」句下說：「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清末孫詒讓撰周禮正義，更就鄭說考訂周公攝政的年代與頒行周禮的時期。今文學家中，最初反對周禮的，大概是與劉歆同時的今文博士。博士的言論雖現在不可考見，但我們只要一讀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就可知道他們爭辯的激烈。所以賈公彥序周禮興廢中說：「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到了東漢，與鄭玄先後的今文學家也堅持反對的論調。「林孝存（即臨碩）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亦見賈疏）清代今文

學復興，與孫詒讓同時的康有爲，採用桐城派方苞周官辨的主張，以爲周禮是劉歆所竄造（見康著新學僞經考卷三）。至於宋學派對於周禮的態度，則或信或疑，各就主見而定。他們中，最初懷疑周禮的爲歐陽修、蘇軾、蘇轍。歐陽修於問進士策一文，以爲『周禮，其出最後，……由今考之，實有可疑者。』（見歐陽文忠公全集居士集卷四十八）蘇軾於天子六軍之制策一文，以爲『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見東坡續集卷九）蘇轍於歷代論一『周公』篇，亦以爲『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見欒城後集卷七）其後如晁說之、如胡安國等，也傾向於懷疑的方面。此外調停各說的，或以爲周公制定而未實行，或以爲間有漢儒的竄改，不過在經學史上增添沒有根據的臆說而已。

儀禮的篇目與次第　儀禮，古單稱曰禮，或稱禮經，或稱士禮。儀禮凡十七篇；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即大戴本，其次第爲：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士喪禮第四，既夕禮第五，士虞禮第六，特牲饋食禮第七，少牢饋食禮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禮第十，鄉射禮第十一，燕禮

第十二，大射儀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大夫禮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二曰戴聖本，即小戴本，其次第爲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士虞禮第八，喪服第九，特牲饋食禮第十，少牢饋食禮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禮第十三，既夕禮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大夫禮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三曰劉向別錄本，亦即鄭玄所注現行本，其次第爲：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聘禮第八，公食大夫禮第九，覲禮第十，喪服第十一，士喪禮第十二，既夕禮第十三，士虞禮第十四，特牲饋食禮第十五，少牢饋食禮第十六，有司徹第十七。

這十七篇的次第，普通因鄭玄儀禮註盛行於後世，所以多主劉向別錄本。唐賈公彥儀禮疏說：「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敍，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小戴……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玄皆不從之。」但清代今文學家主張大戴本次第爲最優。他們根據禮記昏義及禮運篇的話，以爲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爲禮之經；——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里，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一切人事都可用此包括。依

大戴本次第，則一、二、三篇為冠昏，四、五、六、七、八、九篇為喪祭，十、十一、十二、十三篇為射鄉，十四、十五、十六篇為朝聘，喪服通於上下，故附於後。（詳可參考邵懿辰禮經通論）

儀禮的作者問題與完缺問題　儀禮的經典本身有兩個問題到現在仍是爭辯未決：一是儀禮的作者問題，一是儀禮的完缺問題。關於儀禮的作者問題，有兩種絕對不同的意見在古文學派，以為儀禮與周禮並為周公所作，唐賈公彥儀禮疏說可為代表。他說：「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周公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在今文學派以為儀禮為孔子所定，清皮錫瑞三禮通論說可以代表。他說：「檀弓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據此，則士喪出於孔子，其餘篇亦出於孔子可知。」皮氏所撰的經學歷史亦堅持這說，「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補增，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見經學開闢時代章）至於關於儀禮的完缺問題，今古文學亦具有絕對不同的兩種意見。今文學家主張十七篇已包舉一切的禮儀，故以儀禮為完整的經典；上述的清邵懿辰禮經

通論說可爲代表。古文學家主張逸禮三十九篇爲可信，故以現存儀禮十七篇爲秦火的殘燼。（詳下節）

逸禮的來源與眞僞　對於現存儀禮十七篇，亦如今文尚書之外還有孔壁發現的古文尚書一樣，而有所謂「古文逸禮三十九篇」。逸禮的發現，凡有五說：（一）以爲與古文尚書同時發現於孔壁，由孔安國獻於朝廷，劉歆主之。歆讓太常博士書說：『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二）以爲發現於魯淹中及孔壁，班固漢書藝文志主之。志說：『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據劉敞說改）（三）以爲發現於孔壁，爲河間獻王所得，鄭玄六藝論主之。鄭說：『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四）以爲發現於魯淹中，由河間獻王獻於朝廷，隋書經籍志主之。隋志說：『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五）以爲三十九篇外又在河內老屋得一篇，漢王充論衡主之。論衡正說篇說：『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

按以上各說互相差池，所以今文學家根本否認逸禮的發現，而以爲是古文學家僞造的謬言。這三十九篇古文逸禮沒有留傳下來，牠亡佚的時候也無可考證。

禮記的篇第　禮記亦稱小戴記，爲西漢禮今文學家戴聖所編纂，凡四十九篇。其篇目爲：曲禮上第一，曲禮下第二，檀弓上第三，檀弓下第四，王制第五，月令第六，曾子問第七，文王世子第八，禮運第九，禮器第十，郊特牲第十一，內則第十二，玉藻第十三，明堂位第十四，喪服小記第十五，大傳第十六，少儀第十七，學記第十八，樂記第十九，雜記上第二十，雜記下第二十一，喪大記第二十二，祭法第二十三，祭義第二十四，祭統第二十五，經解第二十六，哀公問第二十七，仲尼燕居第二十八，仲尼閒居第二十九，坊記第三十，中庸第三十一，表記第三十二，緇衣第三十三，奔喪第三十四，問喪第三十五，服問第三十六，間傳第三十七，三年問第三十八，深衣第三十九，投壺第四十，儒行第四十一，大學第四十二，冠義第四十三，昏義第四十四，鄉飲酒義第四十五，射義第四十六，燕義第四十七，聘義第四十八，喪服四制第四十九。這四十九篇大概多是孔門七十子後學所記；其有主名可舉的，如經典釋文引劉瓛的話，以緇衣篇爲公孫尼子所作；隋書音樂志引沈約的話，以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

篇子思子所作，樂記篇爲公孫尼子所作。此外月令與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淮南子時則訓略同，明堂位與周書明堂篇略同。又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可視爲儀禮中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聘禮六篇的傳註。

禮記的來源及其爭辯　禮記四十九篇的來源，爲歷來經學家爭辯頗烈的問題。中國現存的著錄古代書籍的目錄，當推漢書藝文志爲最早，但漢志沒有著錄禮記四十九篇及大戴記八十五篇，而只有「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的話。到了漢末，鄭玄撰六藝論說：「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於是始分別大小戴記的篇數。到了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引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序說：「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敍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於是始有小戴刪大戴記以成禮記的話。隋書經籍志繼起，更加附益，以爲：「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敍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

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於是又有小戴刪大戴記爲四十六篇而由馬融增益三篇爲四十九篇的主張。直到清代，諸學者始力駁小戴刪大戴的話。戴震以爲劉向別錄已說禮記四十九篇，小戴弟子橋仁已著撰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則馬融增益三篇的話絕不可靠。（詳見東原集大戴禮記目錄後語）錢大昕以爲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記八十五篇，正合百三十一的數目，所以小戴記並非刪大戴記而成。（詳見廿二史考異漢書考異。）陳壽祺則更進一層，以爲大小戴記對於漢志所說百三十一篇之記，各以己意選取，所以互相異同，並非『此之所棄，卽彼之所錄。』如錢氏所說因爲據他考證，大小戴記篇目每多相同，篇內文字也各有詳略。（文繁不錄，詳見左海經辨。）

禮記各篇的「定性分析」　禮記四十九篇，若就禮記編纂者的小戴（聖）本人的學統說，是無疑的屬於今文學；但就禮記各篇的性質加以考究，則頗有問題。近人廖平以爲禮記及大戴禮兩書，

有先師經說，亦有子史雜鈔，最爲駁雜。牠采自今學的，爲今學家言；采自古學的，則爲古學家言。我們

只要看杜、賈註周禮、左傳對於戴記有引用有不引用，卽可知戴記是最初混淆今古文學的書籍。據廖氏的考證，禮記各篇中（1）屬於今文學的，有：一、王制；二、冠義；三、昏義；四、鄉飲酒義；五、射義；六、燕義；七、聘義；八、祭統；九、喪服四制。（2）屬於古文學的，有：一、玉藻；二、深衣（二篇屬於周禮）；三、祭法；四、曲禮；五、檀弓；六、雜記（四篇屬於左傳）；七、祭義（一篇屬於孝經）；八、內則；九、少儀（二篇屬於小學）；十、禮運；十一、禮器；十二、郊特牲（三篇屬於詩禮）；十三、明堂位；十四、投壺（二篇屬於逸禮）；十五、奔喪；十六、曾子問；十七、喪大記；十八、問喪（四篇屬於喪禮）；十九、喪服小記；二十、大傳；二十一、服問；二十二、閒傳；二十三、三年問（五篇屬於喪服）。（3）今古文學混雜的，有：一、文王世子；二、中庸；三、樂記；四、月令。（4）今古文學相同的，有：一、大學；二、學記；三、經解；四、緇衣；五、坊記；六、表記；七、儒行；八、仲尼燕居；九、孔子閒居；十、哀公問。（見六譯館叢書今古學考卷上兩戴記今古分篇目表及卷下頁十）按廖氏就禮制以分別今古文學，且以分別戴記各篇的今古，殊有特解；但究爲淸末今文學派一家之說，尙未得一般學者的承認。（皮錫瑞爲今文學者，但謂廖說『未必盡可據』，見三禮通論原刻本

頁五五。又康有爲亦爲今文學者，但以禮運爲今文要籍，而爲作註。）

禮學的派別　經典中的三禮，周禮爲古文學，儀禮爲今文學，禮記就學派說屬於今文，就內容說則又爲古今文彙（見上廖平說。）但三禮所說多屬典章制度，在諸經中較難研究；加以漢末鄭玄彙注三禮以來，三禮之綜合的研究因之而起；所以禮學的派別不能如其他經典之能顯然的劃分。現在就可分的分述於下，其不可分的條舉其重要的著作。

禮在漢代顯分爲今古文學兩派。西漢初年，所謂禮經，僅有今文學的儀禮十七篇，由魯高堂生傳授。高堂生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蒼。蒼撰曲臺后倉九篇，見於漢書藝文志（儒林傳稱爲后氏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德從兄子聖及沛人慶普，於是儀禮分爲大戴、小戴、慶氏三家。據漢書藝文志，三家在當時都立於學官；但據後漢書儒林傳，今文學十四博士不數禮慶氏而數易京氏，則慶氏禮是否立於學官亦頗成疑問。其後慶普傳夏侯敬。敬傳至曹充。充傳於其子褒，有名於當時。這是儀禮慶氏學派。戴德傳徐良，這是儀禮大戴學派。戴聖傳橋仁及楊榮，這是儀禮小戴學派。據隋書經籍志說，『三家雖存並微，』則當時禮學已漸衰落。到了東漢末年，鄭玄於注儀禮以外，彙及周禮與

禮記，於是三禮的名稱纔始成立。鄭玄在學派上是一位混淆古今文學的通學者，所以他所注的儀禮，於今文之外並參考當時發現的古文逸禮；經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經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對於今古文字的取捨殊不一致。晉初王肅爲反鄭學的健者，其所作三禮解及儀禮喪服傳，都故意與鄭立異；又僞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二書，以爲反鄭專著之聖證論的根據；然而王肅混淆今古文學的弊病，更甚於鄭玄。儀禮一經，自從鄭、王以後，其今文學的真面目已不復保存。晉代盛行王學。南北朝時，北朝專崇鄭學，南朝則雜採鄭、王。又當時南朝社會劃爲士庶兩大階級，所以治儀禮的，多偏究喪服。最著名的，爲雷次宗、與鄭玄齊名，稱爲雷、鄭；其他見於隋書經籍志的頗不少，蔚爲一時特殊的風氣。唐代賈公彥撰儀禮義疏，以鄭注爲宗，鄭學賴以保存。宋儒治儀禮的，始於張淳。淳曾撰儀禮識誤，考訂注疏。其後朱熹及其弟子黃榦成儀禮經傳通解，欲以儀禮爲經，以周禮諸書爲傳，其混合三禮以談禮，更較鄭玄爲甚。元儒吳澄撰儀禮逸經傳，汪克寬撰經禮補佚，雜採諸書，指爲儀禮逸文；敖繼公撰儀禮集說，且疑喪服傳爲僞作；蓋完全表現其宋學之懷疑的主觀的見地。清代漢學重興，其初反於鄭學，其繼反於西漢今文學。清初治儀禮的，以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爲最具家法。其後如

吳廷華撰儀禮章句，金曰追撰儀禮正譌，沈彤撰儀禮小疏，褚寅亮撰儀禮管見，胡匡衷撰儀禮釋官，程瑤田作喪服足徵錄，任大椿撰深衣釋例，張惠言撰儀禮圖，也都放射漢學的光彩。當時最著名的著作，可以凌廷堪禮經釋例及胡培翬儀禮正義兩書為代表。後來邵懿辰撰禮經通論，主張儀禮十七篇為完書，則更就今文學的見地而為學派上的鬭爭了。

周禮，當西漢末新莽時，因古文學派的首創者劉歆的提倡，立於學官。歆傳其學於杜子春，子春傳鄭興。興傳其子衆。同時，歆又別授賈徽，徽傳其子逵，逵奉詔作周官解詁。其後衞宏、馬融、盧植、張恭祖等，都治周禮，有所述作。及鄭玄出，先後受學於張恭祖及馬融，撰周禮注，與儀禮注、禮記注合稱三禮注，盛行於當時，集漢代周禮學的大成。晉代朝廷禮學雖以王肅為主，但鄭玄周禮注仍為學者所宗。經南北朝以至隋、唐，鄭學迄未衰落。唐賈公彥撰周禮義疏，一本鄭注，於是鄭學益有獨尊之勢。到了宋代，王安石撰周禮新義，頒為試士的標準，周禮學始漸變。王昭禹繼之撰周禮詳解，四庫總目提要譏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說。』此外，鄭伯謙撰太平經國之書，王與之撰周禮訂義，以論議見長，而略於典章。而俞廷椿撰復古編，陳友仁撰周禮集說，吳澄撰周禮敍錄，欲從五官中以補苴冬官，更

完全爲宋學改經的習氣。清代以考證學爲正統，故周禮學復反於漢。當時專究制度的，如沈彤的周官祿田考，王鳴盛的周禮軍賦說；專究製作的，如戴震的考工記圖，阮元的車制考，都是名著。清末古文學最後大師孫詒讓著周禮正義，許稱審慎，學者以爲出於舊疏之上。

禮記一書，不見於漢志；牠的內容的來源學者間的意見也未一致（見上節）；但禮書爲小戴所纂集，所傳授，則大概沒有疑義。（魏張揖、清陳壽祺、皮錫瑞主張禮記始撰於叔孫通，其說不足取信，詳可參考皮錫瑞三禮通論「論禮記始撰於叔孫通」章。）禮記學的傳授，沒有明文可錄。惟後漢書橋玄傳，橋玄七世祖仁曾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則橋仁於傳受小戴儀禮學之外，又兼傳其禮記學。又後漢書曹褒傳，褒傳父充慶氏禮，又傳禮記四十九篇，則曹褒於傳受慶氏儀禮學之外，又兼傳小戴的禮記學。隋書經籍志以爲「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則禮記一書實自鄭注行世後，而始與儀禮、周禮並稱三禮；在漢代諸經中，最無學派可說。南北朝時，爲鄭注作義疏的，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唐孔穎達敎修禮記正義，亦宗鄭注，而以皇氏爲本，以熊氏爲輔。孔序批評熊、皇二書，以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皇氏雖章句

辭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乃時乖鄭義，」但孔氏守疏不破注的原則，所以四庫總目提要又以爲孔氏「務伸鄭注，不免有附會之處。」總之，禮記學，從漢到唐，都以鄭注爲中心。宋儒治禮記的，始於衛湜。湜撰禮記集說，採摭各家經說凡百四十四家，頗稱該博，但不甚精審。元吳澄作禮記纂言，重定篇第；陳澔作禮記集說，務求淺顯；於是鄭注中心之禮記學漸變。明永樂中胡廣等敕修禮記大全，廢棄鄭注，襲用集說，古義遂荒。清代漢學以考證爲主，禮記的研究不及儀禮、周禮之盛。杭世駿撰禮記集說，雖稱浩博，但不免泛濫；朱彬撰禮記訓纂，較爲簡約，然亦不及胡培翬儀禮正義、孫詒讓周禮正義的詳博。及今文學興，禮記各篇中的微言大義始爲學者所重，康有爲撰禮運注，皮錫瑞撰王制箋，對於孔子託古改制的深意及儒家大同的理想，爲大膽的宣揚。

三禮經典本身的學統本不相同，但自從鄭玄兼注三禮以來，三禮之兼治的風習與禮學之綜合的研究，遂爲歷代經學家所沿用。最初繼鄭玄的方法而爲反鄭學的運動的，是晉初王肅。肅曾撰三禮解，與鄭立異。南北朝時，兼治三禮的學者更多；最著名的有徐遵明、劉獻之、沈重、李炫、熊安生、何佟之、王儉、何承天、崔靈恩、嚴植之、沈文阿、戚袞諸人。唐代孔穎達撰禮記正義，賈公彥撰周禮義疏及

儀禮義疏，都以鄭注爲主，三禮學復定於一尊。宋代，朱熹撰儀禮經傳通解，欲混同儀禮、周禮諸書，作禮學之綜合的研究。陳祥道撰禮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都稱其詳博；然中多掊擊鄭學，盡完全宋學家的習氣。清初治三禮的，有徐乾學、萬斯大、毛奇齡、李光地、李光坡、方苞等，然或失之雜糅，或失之武斷。及江永撰禮經綱目，秦蕙田撰五禮通考，始具備漢學家法。但三禮來源不同，綜合研究殊不易易，所以這方面的成功作品仍不多見。

五　春秋——春秋經與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編年的春秋經　春秋經相傳爲孔子據魯史春秋一書加以筆削而成。其書分年紀事，上起魯隱公元年（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下止魯哀公十四年（當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計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表示之如次：

（1）隱公十一年（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周桓王八年、公元前七一二年。）

（2）桓公十八年（當周桓王九年、公元前七一一年至周莊王三年、公元前六九四年。）

(3)莊公三十二年（當周莊王四年、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六六二年。）

(4)閔公二年（當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六六一年，至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六六〇年。）

(5)僖公三十三年（當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周襄王二十五年、公元前六二七年。）

(6)文公十八年（當周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六二六年，至周匡王四年、公元六〇九年。）

(7)宣公十八年（當周匡王五年、公元前六〇八年，至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五九一年。）

(8)成公十八年（當周定王十七年、公元前五九〇年，至周簡王十三年、公元前五七三年。）

(9)襄公三十一年（當周簡王十四年、公元前五七二年，至周景王三年、公元前五四二年。）

(10)昭公三十二年（當周景王四年、公元前五四一年。至周敬王十年、公元前五一〇年。）

(11)定公十五年（當周敬王十一年公元前五〇九年，至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四九五年。）

(12)哀公十四年（當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四九四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年，

傳經的分合　春秋經的經文，現在都分載於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的各傳之前，已沒有單行本；但在古代，春秋經與三傳實各自別行，而且經今古文本亦不相同。漢書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又有春秋經十一卷。所謂古經，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經，也就是左氏傳所根據的古文經；所謂經，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經，也就是公羊傳及穀梁傳所根據的今文經。春秋古經與左氏傳的配合，蓋始於晉杜預。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所說「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的話可為證據。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亦說「舊夫子（指孔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至今文的春秋經與公羊傳、穀梁傳的配合，則不知始於何人。按何休公羊傳解詁但釋傳文而不釋經文，與杜預經傳集解體裁不同；又按漢熹平石經殘字公羊傳一段亦僅載傳文而沒有經文，與現行刻本不同；則漢末今文經傳還各自別行。四庫總目提要疑春秋經與公羊傳的配合始於為公羊傳作義疏的唐儒徐彥，春秋經與穀梁傳的配合始於為穀梁傳作集解的晉儒范甯；然這都是推測之辭，沒有明文足證，可存而不論。至於漢志春秋古經與春秋經篇卷數目不同的原因，則由於今古文學對於魯十二公紀年分合意見的差異。古春秋左氏說主張十二公各為一篇，故為十二篇。今春秋公羊

說主張合閔公於莊公，故十二去一而爲十一卷；至其所以如此併合的理由，今文學大家何休以爲『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閔公僅二年而薨，故附於莊公。但清儒沈欽韓漢書疏證反對何說，以爲不過因『閔公事短，不足成卷，幷合之耳，』亦自有相當的理由。

春秋的命名　春秋經所以命名「春秋，」今古文學家的意見大致相同。因爲春秋是編年體，年有四時，不能徧舉四字以爲書名，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以包「夏」「冬」。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說得很清楚：『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徐彥公羊傳疏亦說：『公羊何氏（指何休）與賈服（指漢時左傳學者賈逵服虔）不異。……春秋者，道春爲生物之始，而秋爲成物之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除上述的解釋外，又另有三種的異說，但都不足憑信。(一)以爲春秋當一王之法，其命名含有賞刑的意義；就是說『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二)以爲含有褒貶的意義，『一褒一貶，若春若秋。』(三)以爲春秋成書時期的關係，『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一二見宋王應麟玉海引

鄭樵語，三見徐彥公羊傳疏。）這三說都根本的忘記了「春秋」是古代記事史籍的通名，而不始於孔子。

春秋的通名與專名　「春秋」本通名，到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於是始成春秋經的專名。公羊傳莊七年傳說：「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禮記坊記說：「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說：「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左傳昭二年傳說：「晉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春秋經所根據的魯史本名春秋。國語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的方法，說：「教之以春秋。」則楚史亦名春秋。國語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說：「羊舌肸習於春秋。」則晉史亦名春秋。墨子明鬼篇下引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隋書，李德林答魏收書引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則諸國史記亦都名春秋。此外泛言春秋的，如管子法法篇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韓非子內儲說上說：「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菽，何為記此？」戰國策燕策蘇代說：「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為春秋。」樂毅說：「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以上所舉，都不能專指為孔子的春秋經而為春秋的通名。

春秋的作者與孔子　春秋爲孔子據魯史而作，古無異辭。但專記孔子言行的論語沒有一言及於孔子的巨著春秋，實不免啟後人以可疑之點。首言孔子作春秋的，當推孟子。孟子滕文公篇下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離婁篇下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盡心篇下說『春秋無義戰。』其後繼孟子之說而更加發揮的，當推司馬遷史記。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然春秋一經，闕文闕義，殊不易研究。宋王安石曾譏爲『斷爛朝報。』近人錢玄同先生更以孔子作春秋的話是孟子所僞造，不是史實，則

春秋與孔子的關係也成爲經學上的疑案了（錢說見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册頁六七——八二）。

左傳與春秋 現行的左傳，據經古文家說，是解釋春秋經的傳，爲孔子同時人左丘明所作，所以應稱爲春秋左氏傳。但經今文家否認這說，他們以爲左傳是古代一種歷史的書籍，並非解釋春秋經，所以不應稱爲春秋左氏傳，而當與呂氏春秋、虞氏春秋相同，稱爲左氏春秋。這爭論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正當的解決，下文當擇要加以論述。不過我們就左傳與公羊傳穀梁傳的經傳內容加以比較，很可以見到同異。一、左傳有續經及續傳，而公羊傳、穀梁傳沒有。左傳的續經，到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止，較春秋本經多二年；左傳的續傳，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哀公如越，又續到悼公四年止，較春秋本經多十七年。二、左傳與春秋經對比，時有闕文。如莊公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但左傳都沒有傳文，而僅有「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諸語。杜預集解以爲「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杜預欲爲左傳出脫，所以委故於簡牘散落，其實無

論如何，經與傳不相稱，乃是非常明顯的事。清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更就今文學的見地，臚舉左傳闕文，如隱公二年、十年，桓公元年、七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十七年，莊公元年以後七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僖公元年等，都可以尋出春秋經與左傳的內容不相對稱。

左傳的作者及其爭辯　左傳的作者，相傳爲孔子同時的左丘明。這說，經古文學家非常相信，但經今文學家又非常反對。以左傳爲左丘明作的最早的現存的史料，當推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史記說：「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但這段文字，近人崔適史記探原設爲七證，以爲係後人爲古文學者依劉歆七略的話竄入，當加刪除，（見史記探原卷四頁二一）則這段史料之眞實的價值，殊可懷疑。其次，說到左丘明作左傳的見解，漢書藝文志及劉歆傳（卷三十六）。漢志說：「仲尼思存先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

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歆傳說：「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按漢志本襲劉歆七略，劉歆爲經古文學家的開創者，他主張左丘明作左傳，乃是必然的事，不足以服經今文學者的辯難。又其次說到左丘明作左傳的，見於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杜氏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按杜預爲左傳專家，其偏祖左氏，更甚於劉歆，則他的話語也沒有信史的價值。又其次，孔穎達左傳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按沈氏指陳沈文阿，嚴氏春秋指漢春秋公羊傳嚴氏學。皮錫瑞春秋通論以爲「嚴氏春秋久成絕學，未必陳時尙存。漢博士治春秋者，惟嚴、顏兩家。嚴氏若有明文，博士無緣不知。如左氏傳與春秋經相表裏，何以有丘明不傳春秋之言？劉歆移讓書，又何不引嚴氏春秋以駁博士？」所以皮氏以爲沈氏所引嚴氏春秋，出於僞託，亦不足憑信。

至於懷疑左傳的，其初以左傳與春秋經無關，其後以左傳爲非左丘明所作。西漢末，今文學博士反對古文學家劉歆，曾主張「左氏爲不傳春秋」（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東漢初，今文學家范升反對古文學家韓歆、陳元，亦曾以爲「左氏不祖於孔子而出於丘明」（見後漢書范升傳）兩漢今文學者雖然反對左傳，以爲與春秋經無關，但尚不否認左傳爲左丘明所作。至唐趙匡，始辨作左傳的左氏與論語上所說的左丘明是兩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賢人，如史佚、遲任等，見稱爲；當時左氏蓋與公羊氏、穀梁氏相似，都是孔門以後的門人。（見陸淳春秋纂例「趙氏損義益章」）宋王安石曾撰春秋解一卷，證明左氏非左丘明的凡十一事。（王書已佚，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出於依託。）葉夢得說左傳記事終於智伯，當是六國時人。鄭樵撰六經奧論，更設八驗，以爲左氏非丘明，而是六國時楚人。清乾隆間紀昀等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於左傳雖仍定爲左丘明作，但措辭亦頗含疑義。（見提要春秋左傳正義條）其後今文學派崛興，劉逢祿撰左氏春秋考證，康有爲撰新學僞經考，對於左傳攻擊益力，且以爲係劉歆由國語竄改而成。近瑞典人珂羅倔倫 (Bernhard Karlgren) 撰論左傳之眞僞及其性質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Tsochuan）一書，用左傳的特別文法組織和「魯語」比較以證明左傳的語言自成一個文法組織，與國語相接近，而決非魯君子所作。這在左傳作者問題的研究方法上實是一種新穎而重要的貢獻。

左傳的來源 關於左傳的發現，古代也沒有明確的記載。約略的說，凡有三說：（一）以為漢代藏於祕府，為劉歆所發現。漢書劉歆傳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說「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按三事指左傳及古文尚書、逸禮）又本傳亦說：「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按今文學家以左傳為劉歆所竄改偽造，則這史料也殊可疑。（二）以為係漢初張蒼所獻。許慎說文解字序說：「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隋書經籍志本其說，亦以為「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按許慎為東漢古文學者，張蒼獻左傳的話不見於西漢他書，恐亦難可憑信。（三）以為發現於孔子宅壁中。王充論衡案書篇說：「春秋左氏傳者，蓋藏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

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又佚文篇說「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春秋三十篇，……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按這說恐是王充謬言，清段玉裁已加以否認。說文解字序段注說：「論衡說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恐非事實。」總之，左傳的來源，在西漢時代，已沒有明確的記載可考。

公羊傳的「異義」　公羊傳爲解釋春秋經而作，就學派言，是屬於今文學。公羊傳與左傳不同之點，在文字方面，一、左傳有續經，續傳，而公羊傳沒有；二、左傳只能說以史實疏證本經，而公羊傳則專就經文逐層地加以問答體的說明。在內容方面，左傳以「史」爲主，而公羊傳則以「義」爲主。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說公羊傳「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據何休文謚例及春秋說，則非常異義有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等等，而以「三科九旨」爲最重要。所謂「三科九旨」，計有二說：一、何休以爲「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是三科九旨也。」二、宋氏以爲「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

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據何休說，九旨卽在三科之內；據宋氏說，九旨另在三科之外，但兩說沒有什麼十分衝突。總之，依春秋公羊學的意見，春秋一經是孔子的政治哲學所在。孔子不願著一部空洞的政治哲學，也不敢著一部空洞的政治哲學，所以借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史實以表示他對於政治的觀念，就是史記自序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對於政治，主張進化，以爲可分三大階段，就是所謂「三世」，也就是所謂由據亂世進爲小康世、由小康世進爲大同世。因政治進化階段的不同，所以又有所謂「存三統」（所謂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及「異內外」的差別。這些話是否把握春秋的核心，固屬一大疑問；但公羊傳以這些思想爲骨幹，則可無疑。此外所謂「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者也。」（徐彥疏引何休文謚例）「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是爲父之道缺也。文元年，楚

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徐彥疏引春秋說）

公羊傳的作者及其學派　公羊傳的傳授源流可考（詳下；）但公羊傳的傳文始於何人，現在還不能確指。漢書藝文志僅有「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的話，而沒有確舉公羊子的名字。顏師古漢書注以爲公羊子名高，蓋據春秋緯說題辭「傳我書者公羊高也」一語。然緯讖本不足憑信，則顏說亦頗可懷疑。據徐彥公羊傳疏引戴宏序說：「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據何休隱二年傳注，以爲「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則公羊傳之著爲文字，或始於公羊壽及胡毋生等；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即定爲公羊壽撰。但近人崔適春秋復始反對這說，他以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則子夏生於定公二年。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餘年。自子夏至公羊壽，甫及五傳，則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餘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

信乎？」按公羊傳的內容，決非成於一人；傳中引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魯子、高子六人，就是明證。（引子沈子見隱公十一年、莊公十一年及定公元年傳文。引子司馬子見莊公三十年傳文。引子女子見閔公元年傳文。引子北宮子見哀公四年傳文。引魯子見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傳文。引高子見定公四年傳文。）又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兩句，穀梁傳引稱沈子，不稱公羊子，則公羊傳中不著姓名的，也當有不出於公羊氏的手筆。又桓公六年、宣公五年傳文有「子公羊子」的稱呼，則公羊傳不全出於公羊氏之手，更有明證。總之，古代的經傳，不是積累而成，就是經過後人的竄改，則公羊傳不是成於一人，也是無容諱言的事。

穀梁傳與公左　穀梁傳的體裁，與公羊傳相近，而與左傳不同。其與公羊傳相近之點：一、沒有解經又重傳；二、用問答式的解釋體裁。現節錄三傳對春秋經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一段以資比較。

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

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少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公羊傳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左傳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按這段以前，左傳有所謂「先經以始事」一段，附錄於下，以明史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

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穀梁傳的作者及其爭辯　穀梁傳在學派上，從來都以爲與公羊傳同屬於今文學；自近人崔適撰春秋復始一書，始斥穀梁傳爲古文學，以爲亦是劉歆所僞造，所以供左傳的驅除。崔氏的立論，雖現在還未得一般學者的承認；但穀梁傳的作者問題之無明文可考，實亦不容諱言。考漢書藝文志僅說「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顏師古漢書注以爲「名喜。」錢大昭漢書辨疑據閩本漢書，又以爲喜字作嘉。此外，桓譚新論、應劭風俗通義、蔡邕正交論、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引麋信注，都作穀梁赤，王充論衡案書篇又作穀梁寘，阮孝緒七錄及元和姓纂引尸子語又作穀梁俶，楊士勛穀梁傳疏又引作穀梁淑。一穀梁子，而有喜、嘉、赤、寘、俶、淑六名，其可疑者一。據楊士勛疏，說穀梁子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穀梁傳當爲穀梁子所自作。然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阮元十三經校勘記的考訂，定公卽位一條，穀梁傳與公羊傳相同，稱引沈子曰；初獻六羽一條，稱引穀梁子曰；隱公五年及桓公六年傳又兩稱引尸子曰；（按尸子卽尸佼，爲商鞅的師；鞅被殺，佼逃於蜀。）如穀梁子確爲子夏門人，不當下見沈子及尸子，亦不當自稱穀梁子，則穀梁傳是否出於一人之手，實亦成爲問題，其

可疑者二。

春秋學的派別　春秋學可分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學及古文學兩派。

西漢初年，春秋分爲五家，爲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據漢書藝文志說「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五家去二而爲遺留到現在的三傳。（關於鄒、夾二氏，極端的今文學者，如康有爲，亦以爲是劉歆虛立名目，故意爲左傳作僞的掩飾。）這三傳，左傳屬於古文學，公羊傳屬於今文學，都非常明確；穀梁傳，從來學者都以爲屬於今文學，自崔適春秋復始倡「穀梁氏亦古文學」之說，於是穀梁傳的學派遂成疑問。

左傳最初的傳授也是古今文學者爭論的一端。按左傳傳授不見於史記儒林傳，漢書儒林傳也僅只是推源到漢初的張蒼，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更進而追溯到春秋時代的曾申、吳起，愈後的記載愈是詳盡，實不免令人懷疑。經典釋文說：「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衞人吳起（魏文侯相）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楚太傅）。椒傳趙人虞卿（趙相）。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御史

大夫張禹。」而漢書儒林傳則說：「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授，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又漢書劉歆傳說：「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總之，左傳的內容是否如今文學者所言出於劉歆改竄國語而成，固屬疑問；但左傳學的傳授，劉歆以前不足信，劉歆以後始可信，實在毫無疑義。

劉歆傳左傳學於賈徽。徽撰春秋條例，傳其子逵。逵受詔奏公羊、穀梁二傳不如左傳四十事，名爲左傳長義，又撰左氏解詁。又陳欽受業於尹咸，傳子元；元撰左氏同異。又鄭興亦受業於劉歆，傳子衆；衆撰左氏條例章句。此外，馬融、延篤等亦治左氏學。漢末鄭玄，初治公羊，後改治左氏，撰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三書，以駁公羊學者何休所撰的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又以所注授服虔；虔撰

左氏章句，盛行於時。三國時，公、穀二學已漸衰微；當時魏王肅撰左氏解，蜀李譔撰左氏傳，而尹默李敏也都治左氏。晉杜預好左傳，譏賈服舊注，成春秋經傳集解，又撰春秋釋例，流傳至今。南北朝時，或宗杜注，或宗服傳，互相排擊，而左氏學遂又分爲兩枝。南朝盛行杜注，梁崔靈恩曾撰左氏條義，申服難杜；但虞僧誕又申杜難服，用以答駁。北朝，因徐遵明傳授服注，作春秋章義，故服注盛行；但杜注得杜預玄孫杜垣的宣揚，亦行於齊地。當時，如周樂遜撰左氏序義，劉炫撰春秋述異、春秋攻昧、春秋規過，張仲撰春秋義例略等，都與杜注立異。到了唐代，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左傳專用杜注，於是賈、服傳注遂亡。其後陸淳綜趙匡、啖助的學說，撰春秋集傳纂例及春秋微旨掊擊三傳，以臆說解經，自成一派，已開宋學的端緒。清代治左氏學的，始於顧炎武杜解集正及朱鶴齡讀左日抄。其後惠棟撰左傳補注，沈彤撰春秋左傳小疏，洪亮吉撰左傳詁，馬宗璉撰左傳補注，梁履繩撰左傳補釋，都以糾正杜注，申揚賈服爲職志。其中的代表作，推李貽德賈服古注輯述及劉文淇左傳舊疏考證二書。清末今文學重興，左傳本身大受攻擊，章炳麟曾撰春秋左傳讀敍錄及劉子政左氏說二書爲古文學張目，然仍未足掩閉今文學家的口舌。

公羊學，漢初始於胡毋生及董仲舒。胡毋生，據徐彥公羊傳疏引戴宏序，是撰著公羊傳的一人。董仲舒公羊學的著作見於漢書藝文志的，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而現存的春秋繁露也頗多公羊傳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仲舒傳嬴公、褚大、段仲及呂步舒。嬴公傳孟卿及眭孟。眭孟傳嚴彭祖及顏安樂。二家都立於學官，於是公羊學又分爲嚴、顏二派。後漢時，何休專主公羊，力排左、穀，依胡毋生條例，撰公羊解詁，流傳至今。三國以後，公羊學逐漸衰落，不及左氏的盛行。南北朝時，北朝僅徐遵明兼通公羊，南朝則公、穀都未得立於學官，惟沈文阿撰三傳義疏，并及公羊而已。唐代徐彥撰公羊傳疏，注取何休解詁，頗得漢學的正傳。清代治公羊學著名的，有孔廣森公羊通義，淩曙公羊禮記、公羊禮疏、公羊問答，曙弟子陳立公羊正義。但諸儒還不是立場於純粹西漢今文學的見地；其憑藉公羊以復興今文學的，當首推莊存與。存與撰春秋正辭，始宣究微言大義，不專事訓詁。存與甥劉逢祿更加鑽研，撰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又撰左氏春秋考證，以斥排左傳，於是今文學的壁壘愈益森嚴。其後宋翔鳳、魏源、龔自珍、戴望、王闓運、廖平、康有爲、皮錫瑞、崔適等輩出，更援引公羊大義以說羣經，甚且欲以解決政治及其他社會問題。如康有爲大同書一書，雖爲超經學的作品，然

仍可視爲由公羊學引申的著作。

穀梁學，相傳始於漢初治魯詩的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江公傳榮廣及皓星公。榮廣傳周慶、丁姓及蔡千秋。千秋又事皓星公，以傳尹更始。更始撰穀梁章句，以傳翟方進、房鳳及子咸。又宣帝時，江公孫爲博士，亦傳穀梁，以傳胡常。當時朝廷曾集經師平公穀異同，韋賢、夏侯勝、蕭望之、劉向都傾向穀梁，於是穀梁學始漸盛。但這說，崔適春秋復始以爲不足信。後漢以來，穀梁學流行的情況遠不及左傳及公羊。東晉時，范甯集唐固、麋信等十數家舊說，成穀梁集解，流傳至今。南北朝時，穀梁且未得立於南朝學官。唐代，楊士勛撰穀梁義疏，以范甯集解爲主，亦未饜漢學者的願望。清代治穀梁的，不及他經之多；較著名的，侯康撰穀梁禮證，柳興恩撰穀梁大義述，許桂林撰穀梁釋例，鍾可丞撰穀梁補注，而以鍾書爲比較詳明，然仍不是可以代替舊疏的著作。

宋學的春秋學以棄傳談經爲特色。這種風氣開始於唐趙匡、啖助、陸淳，而更可以推源到用注駁傳的范甯。宋儒說春秋的，始於孫復。復撰尊王發微，廢棄傳注，專談書法。劉敞繼之，撰春秋權衡等書，以主觀評論三傳得失。此外，如葉夢得、高閌、陳傅良諸人，不是排斥三傳，就是雜糅三傳，全非漢儒

家法。其後胡安國撰春秋傳，假借經文，以論時政，更不顧經傳的原意。而張洽春秋集說、家鉉翁春秋詳說等亦與胡傳相似。然自宋陳深讀春秋編尊崇胡傳以後，元俞皋春秋集傳釋義大成、汪克寬胡傳纂疏繼之，胡傳遂佔有相當地位。到了明洪武間，取胡傳張洽傳合公、穀、左氏，合稱五傳。永樂間，胡廣等撰五經大全，遂直以胡傳爲功令。當時不從胡傳的，僅陸粲袁仁楊于庭數人而已。

六　論語

論語的篇第　現行的論語凡二十篇，爲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先進第十一，顏淵第十二，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衛靈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陽貨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張第十九，堯曰第二十。

論語的種類與變遷　論語在漢代，最初計凡三種：一曰魯論，二曰齊論，三曰古論。梁皇侃論語疏敍引劉向別錄說『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魯論凡二十篇，也就是現行論語所根據的版本。齊論凡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兩篇；即二十篇中的章句，也較魯論

爲多（根據漢書藝文志及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關於問王一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以爲：詳其名稱，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以爲問王疑卽問玉，因篆文相似而誤。說文及初學記等書所引逸論語言玉事，就是這篇的逸文。朱彝尊經義考主王說，以晁說爲傅會。近人陳漢章經學通論以爲：禮記聘義篇有子貢問玉一段；荀子法行篇亦述其說，亦有論玉一段；王肅僞造家語，更襲錄以爲問玉解；則問王當作問玉，更得明證。古論凡二十一篇，分堯曰篇「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另爲一篇，名曰從政篇，所以漢志以爲「兩子張」。古論，漢志以爲出孔子壁中；隋書經籍志以爲與古文尙書同出；何晏論語集解序以爲篇次不與齊論、魯論相同；桓譚新論以爲文異者四百餘字（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這古論，何晏論語集解序以爲孔安國爲之訓解，但世不傳。按孔安國相傳撰古文尙書傳及古文孝經傳，經學家都已證明是僞託，則這古論語傳也甚可疑。清儒沈濤論語孔注辨僞以爲這孔安國古論語傳就是何晏所僞作，很有相當的理由。

魯論、齊論對古論而言，雖都屬今文，但內容亦不相同。自西漢末安昌侯張禹出，於是混合齊、魯而有張侯論。何晏論語集解敍「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隋書經籍志及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更詳盡。隋志以爲「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敍錄以爲「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這可說是論語的第一次的改訂本。東漢末，鄭玄注論語，又混合張侯論及古論而成爲現行的論語。何晏論語集解敍「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隋書經籍志「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鄭氏校魯論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這可說是論語的第二次的改訂本，也就是現行本的來源。

論語篇數的異說　關於論語的篇數，另有一種異說。王充論衡正說篇：「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按王說不甚簡明，但他以爲論語本有三十篇，

計古論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淸劉寶楠論語正義以王說爲「紕繆之談，不足與深辨。」他以爲：「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時博士轉難曉耶？」據劉說，則這論語三十篇的篇目問題大可存而不論。

論語的編者及其爭辯　論語的作者問題，雖亦有不同的意見，但較孝經、爾雅等爲簡單。最初論及論語的纂撰者的，是漢書藝文志。漢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旣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顏師古漢書注「輯與集同，纂與撰同。」則論語的編撰，漢志泛指爲孔子門人。其次，鄭玄論語序以爲係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見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引）；論語崇爵讖以爲係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則又與漢志的泛言門人稍有不同。唐柳宗元更撰論語辯，根據論語記曾子死事，以爲係曾子的弟子所作。他說：「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宋程頤以論語對曾子及有子不稱名，因以爲係

曾子、有子的弟子所論撰（見二程語錄。）宋永亨又以論語對閔子稱字不稱名，因以爲出於閔氏（見經義考卷二百十一引。）則又於柳說曾子的弟子之外另添有子、閔子的弟子。按柳、程、宋諸說皆出於推測，未可卽以爲憑。總之，以論語爲孔門弟子所論撰，其說雖失於泛，但尙不致於如何錯誤。

論語的命名與其別名

論語的名稱，始見於禮記坊記及孔子家語弟子解。孔子家語爲王肅所僞造，不足憑信；坊記，沈約以爲出於子思子，當具有史料價值。則論語之稱爲論語，已始於弟子撰集的時候。王充論衡正說篇以爲孔安國授魯人扶卿，始名論語，其說實不可信。不過論語名稱使用的確定，實始於漢後。兩漢時代，論語一書或單稱爲「論」，或單稱爲「語」，或別稱爲「傳」，或別稱爲「記」，或詳稱爲「論語說」。單稱爲論的，如隸釋載衡方碑文『仲尼既歿，諸子綴論，』論卽指論語。單稱爲語的，如鹽鐵論引論語原文，謂『語曰：百工居肆。』又後漢書邳彤傳引論語原文，謂『語曰：一言可以興邦。』別稱爲傳的，如揚雄法言孝至篇引論語原文，謂『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又漢書揚雄傳贊『傳莫大於論語。』別稱爲記的，如後漢書趙咨傳引論語原文，謂『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詳稱爲論語說的，如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原文，謂：『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按

論語一書，簡稱爲論或語，乃行文的便利。至別稱爲傳或記，則因爲古代論語簡策的長度較短於經。鄭玄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近人章炳麟據以解釋，以「傳」爲六寸簿，即專字的假借。傳的得名，因爲體短，有異於經（見國故論衡文學總略。）則論語之別稱爲傳或記，當因爲簡策長短的緣故。

論語學的沿革　論語學在西漢時代有今古文的派別。上文所述的魯論及齊論屬今文，古論屬古文。當時傳魯論的，有龔奮、夏侯建、夏侯勝、韋賢、蕭望之諸人；傳齊論的，有王吉、宋畸、貢禹、五鹿充宗、庸譚諸人；傳古論的，相傳有孔安國，曾爲撰訓解。其後張禹混合魯、齊，成爲張侯論。後漢時，包咸、周氏爲張侯論撰作章句，而馬融亦爲古論撰注。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盛行於當時。鄭注早亡，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及袁鈞鄭氏遺書都有輯佚本。近燉煌千佛洞石室發現鄭注論語殘本，亦略可供參考（見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國時，魏王肅曾撰論語解，與鄭注故意立異；陳羣、周生烈亦各撰義說。晉代王弼於注周易、老子之外，兼及論語。而何晏諸人又雜採漢、魏經師八家之說，成論語集解，流傳至今。南北朝時，北朝盛行鄭學，南朝仍以何晏集解爲主。當時有

名的著作爲梁皇侃論語義疏，皇疏，據四庫總目提要考證，亡於南宋；淸乾隆間復由日本傳入中國，蓋非出於依託。隋、唐兩代，論語學無甚名著。韓愈、李翺撰論語筆解，以空說解經，漸開宋學的端緒。宋儒治論語的，首推邢昺所撰的正義，就是今十三經注疏本的論語疏。邢疏根據皇疏，翦其枝蔓，傅以義理，爲漢學、宋學轉變期的作品。自從程頤表章論語，於是開義理說經之風。程氏弟子如范祖禹、謝顯道、楊時、尹焞等，對於論語都有所述作。及南宋朱熹出，輯集宋儒十一家的學說，旣撰論語集注，又撰論語或問（四書或問之一部分）及論語精義（合孟子精義，總稱論孟精義。）熹弟子黃榦續撰論語注義通釋。同時治論語而較有名的，爲張栻、朱震。元、明以降，論語學大抵以朱注爲中心。淸初治論語的，尙不脫宋學的範圍。及劉台拱撰論語駢枝，方觀旭撰論語偶記，錢坫撰論語後錄，包愼言撰論語溫故錄，焦循撰論語通釋，始復漢注之舊；其中以劉、焦二氏的書爲精審。其後劉寶楠撰論語正義，以何晏集解爲主，而詳採各家之說，其詳博超於舊疏。及今文學興，劉逢祿撰論語述何，宋翔鳳撰論語發微，戴望撰論語注，又自成一家之言。最後黃式三撰論語後案，調和漢、宋，亦時有持平之論。至專究論語中的名物制度，完全表現考證學的色彩的，有江永的鄉黨圖考一書。

七　孝經

孝經的篇第　現行的孝經分爲十八章，爲開宗明義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諸侯章第三，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庶人章第六，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聖治章第九，紀孝行章第十，五刑章第十一，廣要道章第十二，廣至德章第十三，廣揚名章第十四，諫諍章第十五，感應章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喪親章第十八。

孝經的版本及其爭辯　孝經雖然是諸經中文字最少的一經，——據經義考引鄭耕老的話，孝經只一千九百三字。——但版本的爭辯也很複雜。孝經歷來的本子，大體的說可分爲四種：一、今文本。二、漢代古文本；三、隋代後得古文本附有孔安國傳；四、清代後得日本古文本亦附有孔安國傳。

一、今文本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孝經一篇十八章」的本子。據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及隋書經籍志說，秦時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獻出，凡十八章。但這說不見於漢以前的書，不知釋文及隋志何所根據。這今文本流行於西漢。西漢末，劉向用今文本與古文本相校，

去其繁惑，以十八章的今文本爲定（據隋志說）這可說是今文的第一次的改訂本。東漢末，有鄭氏注出現，相傳爲鄭玄所注，流行於南北朝時，（也據隋志說，鄭氏注之前，鄭衆、馬融也曾注孝經，但早亡佚。）這可說是今文的第二次的注釋本。唐開元七年，因孝經今文鄭玄注本與隋代後得古文孔安國注本旨趣毆躃，下詔令諸儒質定。時左庶子劉知幾主古文，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貞幷以爲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及注文「脫衣就功」等語。當時下詔採用貞說，仍主今文鄭注本（見唐會要。）這可說是今文的第三次的改訂本。唐開元十年，唐玄宗注孝經，頒行天下；天寶二年，玄宗又重注孝經頒行（也見唐會要。）天寶四年，以御注刻石於太學，稱爲石臺孝經，今尙存陝西西安府學中，這可說是今文的第四次的注釋本，也就是現在流行的十三經注疏本的來源。

二、古文本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的本子。這古文本的出現，據漢志說，出於孔子宅壁中；據隋書經籍志說，與古文尙書同出。（按古文尙書出於孔壁，古文孝經旣與古文尙書同出，則亦出於孔壁，與漢志說同。）據後漢許愼子沖上說文解字表說：「古文孝

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衞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則又與漢志、隋志微異。按孔壁出書事，漢代及清代今文學者多不相信；許沖說亦不知何所根據，所以也頗可懷疑。這古文孝經凡二十二章，比今文孝經多四章，據顏師古漢書注引劉向說，謂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一章。據隋書經籍志說：「長孫（長孫氏今文孝經本）有閨門一章……又衍出三章，幷前合為二十二章。」漢書注引桓譚新論說：「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則今古文本孝經的篇章字數也頗有異同。孔安國古文孝經傳，始見於王肅家語後序。隋志亦說孔安國曾為古文孝經作傳。但這說未見於漢志及以前書，亦頗可疑。隋志說：「安國之本亡於梁亂，」則漢代的古文孝經本當南北朝梁代卽已亡佚。

三、隋代後得古文本的來源，始見於隋書經籍志。據隋志說，從古文孝經亡於梁亂以後，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古文孝經孔安國傳，送給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後來朝廷聞知，下令與今文孝經鄭玄注並立於學官。但當時儒者都說這後得的古文本及孔傳是劉炫偽作，不是孔安國的舊本，而且祕府又沒有原書，無從校正牠的眞偽，所以遂成為經學上的一大疑案。

唐開元七年，下詔令諸儒質定今古文孝經，劉知幾主古文，以爲隋代後得的古文孝經就是漢代孔壁的古文孝經。他序述隋代古文本及孔傳的來源，較隋志更爲詳盡。他說：「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則他以爲後來的古文本及孔傳是真品，不過經過劉炫的刊改。當時司馬貞主今文，以爲隋代後得的古文孝經孔傳是僞品，但不是劉炫所僞作。他說：「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到了清代，盛大士爲丁晏孝經徵文作序，以爲古文孝經孔傳是晉王肅所僞造。他說：「安國作傳，漢人不言，獨家語言之。家語爲王肅僞撰，而安國之注孝經，有與家語暗合者。且隋志所載王肅孝經解久佚不傳，今略見於邢昺疏中，而邢疏所引之王肅注，多與孔傳相同，是必王肅妄作，假稱孔氏，以與己之臆見互相援證。……疑爲劉炫作，而不知劉炫得之於王劭，劭與炫皆被欺於王肅。」這後得的古文本孝經及孔安國傳，自從唐玄宗注行世後，遂亦亡佚。中興藝文志說：「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

四、清代後得日本古文本及孔傳，係乾隆間流入中國。據鮑廷博乾隆丙申（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年）該書新刊跋說他的朋友汪翼滄附市舶到日本，得於日本的長崎澳。據四庫總目提要的考訂，這是日本原有相傳的書，不是鮑廷博所偽造。但孔安國傳文『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并不類唐、宋、元以前人語。殆市舶流通，頗得中國書籍，有桀黠知文義者，摭諸書所引孔傳影附為之，以自誇圖籍之富。』阮元孝經注疏校勘記序亦說：『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即存，不過如尚書之偽傳，決非真也。』考該本本經僅一千八百五十字，與今文異的止二百餘字，與桓譚新論的話不合，決非真古文本。這日本本的古文孝經及孔傳現尚存。

孝經的作者及其爭辯　孝經的作者問題，歷來經學家的意見亦殊不一致。關於這問題，約可分為七說：（一）以孝經為孔子所作。漢書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鄭玄六藝論『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三國志蜀志秦宓傳『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二）以孝經為孔子弟子曾參所作。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以曾參為能通孝

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三)以孝經爲曾子弟子所作。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今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王應麟困學紀聞引胡寅語，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四)以孝經爲曾子弟子子思所作。困學紀聞引馮椅語，謂「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五)以孝經爲七十子之徒所作。毛奇齡孝經問「此是春秋、戰國間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後於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居、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如出一手。故每說一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爲證，此篇例也。」四庫總目提要「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爲近，要爲七十子之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採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六)以孝經爲後人傅會而成。朱熹孝經刊誤後序引汪應辰說，謂「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傅會。」(七)以孝經爲漢儒所僞作。姚際恆古今僞書考「是書來歷出於漢儒，不惟非孔子作，併非周、秦之書也。……勘其文義，絕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之類，同爲漢儒之作。」按以上七說，(一)(二)兩說，以孝經爲孔子或曾子所作，自不足信。(三)(四)兩說以孝經爲曾子弟子或子思所作，亦係揣

測之辭。(六)(七)兩說，以孝經爲後人或漢儒僞作，雖有特見；但呂氏春秋孝行、察微二篇曾引孝經原文，蔡邕明堂論及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亦曾引魏文侯孝經傳文，則孝經的來源似頗久遠，恐不是漢時所僞造，所以愼重點說，倘以第(五)說爲較合理，卽以孝經爲七十子後學的作品。

孝經學的派別　孝經學可分爲「漢學」與「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與「古文」兩派。

關於孝經學的著作，最早的當推魏文侯孝經傳；但這書，不見於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以爲漢志中孝經雜傳四篇中當有魏文侯孝經傳在內，說亦可疑。西漢時，孝經學分今古文兩派。傳今文的，有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五家，所著孝經說都見於漢志。東漢時，有鄭注出現，或以爲是鄭玄所注，或以爲非是，成爲經學家的爭辯的問題。(晉荀昶信爲鄭玄注，齊陸澄以爲不與玄其他注書相類，唐陸德明亦以爲與玄注五經不同，劉知幾更設十二驗以爲非玄作，宋王應麟以爲係鄭玄孫小同所撰。詳可參考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二。)東漢以後，多宗鄭注。南北朝時，立於學官。當時南朝治孝經的有李炫、樂遜、樊深諸人，北朝有王規、張璣、顧越諸人。唐開元間，會

諸儒質定孝經鄭注及孔傳優劣，仍主鄭注。唐玄宗御注孝經，刻石太學，亦宗今文孝經，并詔元行沖撰疏。宋邢昺孝經疏即以行沖疏爲藍本，今列爲十三經注疏本之一。清初始治孝經的，爲毛奇齡，撰孝經問，詆排宋儒的孝經學。丁晏繼作孝經徵文，更力攻古文孝經孔傳是僞書。嚴可均輯孝經鄭注，皮錫瑞撰孝經鄭註疏，都從事於鄭學的恢復。姚際恆撰古今僞書考，直列孝經爲僞書，則已越超經學的研究而爲史的考訂了。

漢代傳古文孝經的，相傳爲孔安國，昭帝時由魯國三老獻於朝廷，然其說殊不可信。西漢末，劉向曾加以校定。東漢時，許慎撰說，馬融撰注，但都早已亡佚。隋代，王孝逸得僞古文孝經孔傳，由王劭以示劉炫。炫信以爲真，爲撰孝經述義。唐開元間，劉知幾主古文孔傳，然未被朝廷採用，孔傳因而漸亡。清乾隆間，汪翼滄重得日本古文孝經孔傳本，流行國內，學者多不置信，以爲是僞中之僞。

宋儒孝經學，以改竄經文爲特點，自具有宋學的面目。朱熹信古文孝經，因胡寅、汪應辰的話，撰孝經刊誤，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删改舊文二百二十三字。元董鼎撰孝經大義，更就朱本加以訓釋。同時吳澄又信今文孝經，撰孝經章句，仿朱熹刊誤的方法，分爲經一章，傳十二章。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說：『漢儒說經以師傳；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宋儒說經以理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然守師傳者，其弊不過失之拘；憑理斷者，其弊或至於橫決而不可制。』（見毛奇齡孝經問答）蓋對於宋儒孝經學頗有微辭。

八　爾雅

爾雅的篇第　爾雅是古代的詞典；牠附屬於經部，完全出於因襲的觀念。現行的爾雅凡十九篇：為釋詁第一，釋言第二，釋訓第三，釋親第四，釋宮第五，釋器第六，釋樂第七，釋天第八，釋地第九，釋丘第十，釋山第十一，釋水第十二，釋草第十三，釋木第十四，釋蟲第十五，釋魚第十六，釋鳥第十七，釋獸第十八，釋畜第十九。

爾雅的命名　爾雅二字，或作爾疋，又作邇疋（見陸德明經典釋文。）顏師古漢書注引張晏注謂：『爾，近也。雅，正也。』釋文加以申說，謂：『言可近而取正也。』清阮元更詳加解釋，謂：『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音之所異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

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於王都之正言也。……爾雅一書，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於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於官話者也。揚雄方言自署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夫絕代別國，尚釋之，況本近正者乎！言由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為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見揅經室集卷五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按阮氏解釋爾雅的命名，非常詳明，而且爾雅一書在語文學上自有相當的價值，也可由此而明瞭。

爾雅的篇數問題與其解釋　爾雅的篇數，始見於漢書藝文志。據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與現存篇數相較，計缺一篇。這一篇的亡缺問題，歷來學者間的意見很不一致。略言之，可分三說：（一）以為爾雅本另有「序篇」一篇，後來亡佚，故二十減一而為十九篇。爾雅之有「序篇」，一如周易的序卦、尚書的書序、詩的大小序。考詩周南關雎詁訓傳正義引爾雅序篇說：『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這就是序篇的逸文。這說，陸堯春及葉德輝主之（見經義叢鈔引及漢書補注引）。按這說有難通之點；孔穎達毛詩正義作於唐初，如果唐初尚存序篇，則晉郭璞為

爾雅作注，決不至於删而不錄。(二)以爲爾雅當另有釋禮一篇，其篇次在釋樂篇的前後。現爾雅釋天篇中「祭名」、「講武」「旌旂」三章，都與「天」無關，當是釋禮篇的殘文錯簡。這說，晴江劉氏及崔應榴主之（見崔應榴吾亦廬稿及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引。）按這說也有難通處；考魏張揖廣雅的篇第全依爾雅；如果爾雅另有釋禮篇，則廣雅不應沒有。(三)以爲爾雅沒有缺篇，因爲釋詁篇在漢時分爲上下二篇，所以是二十篇。這說孫志祖主之（見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按這說在古時也沒有正證或旁證。邵晉涵爾雅正義說：『考諸書之徵引爾雅者，似有佚句而無闕篇，班固所言篇第，今莫可考，』則這爾雅的篇數也只好暫時存疑而不論。

爾雅的作者及其爭辯　至於爾雅究竟作於何人，學者間的爭辯更其激烈。最初說到爾雅作者問題的，是魏張揖。張揖上廣雅表說：『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尅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傳於後冐。歷載五百，墳典散署，惟爾雅恆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後，超絕六國，越踰秦、楚，爰曁帝劉，魯人

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既無正驗，聖人所言，是以疑不能明。」據張揖說，爾雅一篇爲周公作，其餘相傳爲孔子、子夏、叔孫通、梁文諸人所增益。他以爾雅爲周公作的理由，是因爲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篇及春秋緯元命包篇已說及爾雅。其實這些理由都非常薄弱，三朝記及元命包的著作時間及著作者根本就很可懷疑，牠們所傳的孔子及子夏的話根本就沒有信史的價值。況且孔子、子夏以前的書也未見得就是周公所作；這已是中國道統成立後的謬言。至於後儒考證爾雅多周公以後事，更其明證（見邢昺爾雅疏及王應麟困學紀聞，文繁不錄。）其次根據張揖的話而再以附益的，是唐陸德明。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說：「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這因爲周公作爾雅說不能盡通，所以僅將第一篇釋詁歸於周公，根本仍是附會之辭。又其次以爲是孔子門人所作；主這說的，是漢鄭玄及梁劉勰。周官大宗伯疏引鄭玄駁五經異義說：「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以釋六藝之文言。」詩大雅鳧鷖疏引鄭志，亦說是孔子門人所作。劉勰文心雕龍練字篇主張鄭說，說：「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但據宋

曹粹中放齋詩說考訂，爾雅成書，當在作詩故訓傳的毛公之後。（見四庫總目提要爾雅注疏條引，文繁不錄。）那麼，孔子門人作爾雅的話也不能成立。比較合理的，還是四庫總目提要的主張。牠以爲爾雅一書「大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託之詞。」「今觀其文，大抵採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爲一書，不附經義。」「蓋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說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故從其所重，列之經部耳。」因爲據牠的考證，爾雅不專爲五經作，而且雜取楚辭、莊子、列子、穆天子傳、管子、呂氏春秋、山海經、尸子、國語等書。總之，古代的文字學的書籍大概不出三類：一爲小學學童的教科書，大抵爲四言或三七言的韻語，所以便於記憶，如漢志所著錄的史籀、蒼頡、凡將、急就、元尙、訓纂等書，其性質與後世的三字經、千字文相同。二爲依據字形分部，加以解釋，始於許愼的說文解字，其性質等於現代的字典。三爲依據詞類分篇，加以說明，如爾雅一書就是，其性質等於現代的詞典。因爲爾雅是詞典，所以歷經增改，不能確定誰是作者（採近人呂思勉經子解題說。）

爾雅的來源　爾雅的來源無可考，不像今文易、書、詩、儀禮、春秋、論語等之有明文可據，所以近代今文學者每加以排斥，以爲當屬於僞造的古文經典。淸初陳啟源撰毛詩稽古編，考證爾雅中的

訓詁多與古文學家毛公的詩故訓傳相同。其後孫星衍於爾雅釋地四篇後敍一文中說：『爾雅所紀，則皆周官之事。』據他的考證，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即周禮的「誦訓」及「訓方氏」所掌；釋親、釋宮二篇即周禮的「小宗伯」所掌。釋器一篇，即周禮的「獸人」、「內饔」「職金」、「司弓矢」、「典瑞」、「典絲」諸官所掌；釋樂一篇即周禮的「典同」所掌；釋天一篇即周禮的「眡祲」「保章氏」、「甸祝」「詛祝」、「司常」、「巾車」諸官所掌；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四篇即周禮的「大司徒」、「職方氏」、「山師」、「川師」、「遂師」諸官所掌；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六篇即周禮的「大司徒」、「山師」、「川師」、「土訓」、「倉人」、「囿人」諸官所掌；釋畜一篇即周禮的「庖人」、「校人」、「雞人」諸官所掌。到了清末廖有爲，以今文學家的立場，根據陳、孫二氏的話，確定爾雅完全是古文學的作品。他在新學僞經考卷三說：『爾雅訓詁以釋毛詩、周官爲主。釋山則有五嶽，與周官合，與堯典、王制異。釋地九州與禹貢異，與周官略同。釋樂與周官大司樂同。釋天與王制異。祭名與王制異，與毛詩、周官合。』總之，爾雅以詞的研究爲主體，所謂以名物訓詁爲宗，已染有很濃厚的古文學氣味，則其內容與古文學經典息息相通，自是必然的事。

爾雅學的沿革　爾雅的性質屬於古文學，故別無派別可言。始爲爾雅作注的是漢武帝時犍爲舍人。（舍人或以爲官名，或以爲人名；盧文弨、邵晉涵、宋翔鳳、洪頤煊等主前說，錢大昕、劉師培等主後說。）其後揚雄、劉歆亦崇信爾雅，劉歆且爲爾雅作注。東漢時，注爾雅的有樊光、李巡、孫炎、鄭玄。（玄注見周禮賈公彥義疏引）三國以後，有王肅、謝氏、顧氏。晉郭璞撰爾雅注、爾雅音、爾雅圖、爾雅圖讚，可謂集爾雅學的大成。南北朝時，南朝盛行雅學，撰注的有沈旋、陶弘景，撰疏的有孫炎（別一孫炎、）高璉，撰音的有沈旋、施乾、謝嶠、顧野王、江灌，撰圖讚的有江灌。隋、唐時，曹憲撰爾雅音義，裴瑜、劉邵撰爾雅注，亦足以補正郭注。宋代，邢昺以郭注爲主，撰爾雅疏，但過於簡陋，未能滿學者的願望。此外羅願撰爾雅翼，陸佃撰爾雅新義，更其穿鑿破碎。蓋宋、元、明三代是文字學衰落時期，同時亦可說是爾雅學衰落時期。清代樸學重興，文字學爲治學入門工具，於是爾雅學突然發達。當時的代表作爲邵晉涵爾雅義疏及郝懿行爾雅正義。二書雖都以郭注爲主，但邵書守疏不破注的原則，有時不免曲解；郝書則博采漢注，訂正訛謬，而且能由聲音以推求詁訓，殊得訓詁學的祕訣。此外臧庸輯爾雅舊注，葉蕙心撰爾雅古注斠，開爾雅輯佚學的一派。近人胡元玉撰雅學考，詳述雅學源流，亦頗

便參考。

九　孟子

孟子的內篇與外篇　現行孟子計七篇，篇各分爲上下，爲梁惠王篇第一，公孫丑篇第二，滕文公篇第三，離婁篇第四，萬章篇第五，告子篇第六，盡心篇第七。這七篇稱爲「內篇」。另有「外書」四篇，爲性善辨一文說二孝經三爲政四。這四篇漢趙岐孟子題辭以爲出於後世依託；他說：「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按這四篇早已亡佚，今所傳的孟子外書係明人僞造，不足信。清周廣業撰孟子四考，其一爲孟子逸文考，搜集孟子的逸文頗備。

孟子的作者及其學說　孟子的作者，歷來學者間也有數種不同的意見。（一）以孟子爲孟軻所自作。史記孟子列傳「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此書，孟子之所作也，

故總謂之孟子。」「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應劭風俗通義窮通篇「孟軻受業於子思，旣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晉傅子說：「昔仲尼旣殁，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二）以孟子爲孟子的門弟子所作。與姚信士緯「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見太平御覽引）唐韓昌黎答張籍書「軻之書非自著，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晁說之語「按此書，韓愈以爲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考其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爲然。」（三）以孟子爲孟子所自作，而經門弟子的敍定。清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敍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四）以孟

子爲孟子的門弟子所作，而且雜有再傳的門弟子的紀錄。宋林之奇孟子講義序「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清周廣業孟子四考「此書敍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答，斷非輯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萬章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於孟子之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其後編次遺文，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門人與爲之。」按以上四說各自有其理由，但以理推斷，或以第四說爲較優。

孟子的「升格運動」 孟子一書，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都列入子部儒家。據趙岐孟子題辭，以爲漢孝文帝時，曾置博士。然這事不見於漢書，說頗可疑。清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根據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以爲孟子博士的廢罷，當因董仲舒對策專崇六藝之故。但這也是推測之辭，不足憑信。將孟子與論語同列於經部，始於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陳氏以爲「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六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據近人陳漢章經學通論的考訂，宋大中

祥符七年（公元一〇一四年，）孫奭上新印孟子音義；嘉祐六年（公元一〇六一年，）劉石備九經；都已尊崇孟子。王應麟玉海亦說國朝（宋代）以孟子升經，並論語、孝經爲三小經。則孟子之被表章，固不始於程朱諸儒及陳振孫氏。再推而上之，唐代宗寶應二年（公元七六三年，）禮部侍郎楊綰疏請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見唐書選舉志。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進士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見皮子文藪及文獻通考。則孟子升列經部的運動，實始於唐而完成於宋。宋淳熙間，朱熹以論語與孟子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並列，四書之名始立。元延祐間，復行科舉，四書一名更見於功令。於是孟子遂與論語並稱，而由子部儒家上躋於經部。

孟子學的沿革　漢代治孟子的，始於揚雄。雄注孟子，見於中興藝文志，然旨意淺近，當時已疑爲依託。後漢注孟子的，有程曾（見後漢書儒林傳、）高誘（見呂氏春秋敍、）鄭玄、劉熙（都見隋書經籍志，）但都已亡佚。僅趙岐作孟子章句，并撰題辭，至今猶存，列爲十三經注之一。當時非議孟子的，有王充。充曾撰刺孟篇，見於論衡。三國以後，治孟子的，有晉人綦毋邃；唐代，陸善經撰孟子注，張鎰撰孟子音義，丁公著撰孟子手音，也都亡佚。宋代，孫奭撰孟子音義；今所傳孫奭孟子正義，朱熹以

爲邵武士人所假託，非出奭手。從二程表章孟子以後，孟子成爲儒家哲學的重鎭。朱熹撰孟子集注，又撰論孟精義，又撰四書或問，會集宋儒二程等十二家之說，而下以己意，於是朱注孟子遂成爲元、明以來孟子學的中心。但北宋時，非議孟子的，也頗有其人。如馮休刪孟子，李覯撰常語，司馬光撰疑孟，都對於孟子一書致其不滿。清代治孟子的，閻若璩撰孟子生卒年月考，周廣業撰孟子四考，一反宋明以來空言性理的舊習。焦循撰孟子正義，折衷趙注，廣博精深，遠在舊疏之上。戴震撰孟子字義疏證，就孟子舊說，提倡理欲一元論，以反抗宋儒的理欲二元論，已由經部的考證而躍入於哲學的辯詁。清末康有爲撰孟子微，更就孟子實述孔子的話語，竭力發揮儒家託古改制說，蓋又完全變爲經今文學家的立場了。